

## 比興與微言之辨：以蔡元培紅學的經學淵源為中心\*

李貴生\*\*

(收稿日期：103年5月22日；接受刊登日期：104年3月25日)

### 提要

本文以蔡元培的《石頭記索隱》為基礎，具體探討索隱派紅學與傳統經學的關係。文章首先檢討源出《春秋》學此一流行說法的不足之處，繼而闡明《詩經》傳箋之學對蔡元培紅學的詮釋視野及其操作方法的影響。經過深入辨析後，我們認為蔡氏索隱的詮釋取向實與傳統《詩經》學有更為密切的關係，而他所列舉的三種研究方法中，亦有兩項與傳箋之學相契合。這些發現有助闡明經學詮釋傳統對文學批評的影響。

關鍵詞：比興、微言、蔡元培、紅學、經學、淵源

---

\*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「優配研究金」(General Research Fund, Research Grants Council)資助項目(編號842212)的部分研究成果，承蒙本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，謹此致謝。

\*\*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研究學系副教授。

## 一、前言

蔡元培的《石頭記索隱》不但是近代紅學史上的名著，同時亦標誌著一種學術研究的形態和規範。余英時很早便意識到《石頭記索隱》帶有普遍的學術意義，認為此書代表了胡適新紅學出現之前的研究典範，「蔡元培實際上乃是索隱派『典範』的總結者」。<sup>1</sup>從文學研究史的角度看，弄清索隱派紅學的研究取向，不但有助瞭解近代紅學的發展，還可加深大家對傳統文學研究範式的認識。可惜自從胡適在《紅樓夢考證》中提出猛烈、尖刻的批評後，索隱紅學便長期與「猜笨謎」、「穿鑿附會」、「牽強」、「無稽」等詞語連結起來，<sup>2</sup>被主流紅學家摒棄在嚴肅學術的範圍之外，<sup>3</sup>結果導致大家對這一流派所代表的學術典範，仍然缺乏足夠的認識。

與自詡運用科學方法的新紅學相比，<sup>4</sup>以索隱為核心的舊紅學顯然與傳統學術有更為密切的關係。顧頡剛於 1922 年給胡適的信中，即敏銳地指出：「實在蔡先生這種見解是漢以來的經學家給與他的」。他覺得這些經學解釋圓通得很，無施不可，「講《詩經》的，好詩可為刺詩，男女可為君臣，講《紅樓夢》亦何嘗不可男變為女，家事變為政事。」<sup>5</sup>句中雖然不無調侃嘲諷之意，卻也道出經學作為古典學術的淵藪，<sup>6</sup>對索隱派的學術信念和詮釋方法俱有不容忽視的影響。然而，這種影響到底有甚麼具體內涵，似乎尚有深入討論的必要。

<sup>1</sup> 余英時：〈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——一個學術史的分析〉，載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1 年），頁 6-7。

<sup>2</sup> 胡適：《紅樓夢考證》，載歐陽哲生編：《胡適文集》第 2 冊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 年），頁 432-440。

<sup>3</sup> 然而在學院派的範疇之外，索隱派仍然極有影響力。關於這一派在二十世紀的發展，可參看劉夢溪：《紅樓夢與百年中國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 年），頁 144-230；陳維昭：《紅學通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頁 115-127、338-341 及 599-612；郭玉雯：《紅樓夢學——從脂硯齋到張愛玲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2004 年），頁 179-241。

<sup>4</sup> 胡適《紅樓夢考證》末句明言自己要「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『紅學』，創造科學方法的《紅樓夢》研究。」同註 2，頁 465；顧頡剛〈紅樓夢辨序〉也強調：「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，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」，文章收入俞平伯：《俞平伯論紅樓夢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），頁 79。

<sup>5</sup> 《胡適日記》，1922 年 3 月 13 日，見胡適著，季羨林主編：《胡適全集》第 17 冊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 年），頁 539-540。

<sup>6</sup> 傳統學者每把經書視為深不可測、義蘊無窮的聖典，相信其內容仿如百科全書般，涵蓋各種知識領域，如焦循〈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〉謂：「經學者，以經文為主，以百家子史、天文術算、陰陽五行、六書七音等為之輔，彙而通之，析而辨之，求其訓故，核其制度，明其道義，得聖賢立言之指，以正立身經世之法。」見《雕菰集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7 年），影文選樓叢書本，卷 13，頁 22。

索隱研究固然與傳統的史學和小說研究有關，<sup>7</sup>不過近代學者論及索隱派的學術淵源時，多上溯至中國經學的傳統。他們有的如顧頡剛那樣，認為索隱紅學源自《詩經》比興之義，<sup>8</sup>以及後來《離騷》「香草美人」的表現手法。<sup>9</sup>不過更多學者相信，索隱紅學以考證歷史本事為目標，與《春秋》的詮釋傳統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，相信「《紅樓夢》成功地運用了『春秋筆法』來寄寓『微旨』」，<sup>10</sup>故索隱派考證小說背後的本事，亦採取了「解讀《春秋》筆法」的「本事注經方法」<sup>11</sup>。有些學者甚至具體地指出，索隱派所運用的方法實來自以《公羊傳》為中心的今文經學傳統，認為「紅學中的索隱派接近於西漢今文學，以探求『微言大義』為宗旨」。<sup>12</sup>

表面看來，《詩經》的比興與《春秋》的微言的確有相類似的方面，如二者皆強調經書的文字可以通過獨特的表達方式（比興、微言/筆法），涵蘊超越字面之外的深意（隱喻、大義/本事），難怪有學者倡言它們都是索隱派解讀模式的根源。<sup>13</sup>這類左右逢源、漁翁撒網式的溯源方法自然有其穩當之處，不過從辨章學術的角度看，如此寬鬆浮泛的解說至少有兩個明顯的問題。首先，它未能準確地說明索隱派與傳統經學的關係，須知關注書寫策略、強調言外之意，絕非儒家經傳的專利，古代其他典籍亦有許多相近的言論。如《莊子》便說過「可以言論者，物之粗也；可以意致者，物之精也」，教人「得意而忘言」，並且注意到「寓言」、「重言」、「卮言」等獨特的表述手法。<sup>14</sup>要是《詩》傳比興、《春秋》筆法亦不過強調言外之旨，那麼傳統經學與索隱紅學便不見得有與眾不同、獨一無二的連繫了。此外尤其重要的是，比興與微言雖然同屬經學的範疇，但二者實際上源自《詩經》和《春秋》兩部不同的經典。傳統學者對這兩部典籍的特質和功能上差別，俱有相當自覺的

<sup>7</sup> 關於蔡元培紅學與史學及小說研究的關係，可參李貴生：〈索隱的合法性及其局限：蔡元培、胡適紅學論爭的範式意義〉，《東方文化》，2014年第47卷第1期（2014年），頁35-46。

<sup>8</sup> 參陳維昭：〈索隱派紅學與詩騷學術傳統〉，《汕頭大學學報（人文科學版）》，1995年第11卷第1期（1995年），頁42。

<sup>9</sup> 顧友澤：〈對紅學索隱派研究方法的再思考〉，《蘇州教育學院學報》（2005年9月），頁39。

<sup>10</sup> 陳才訓：〈「春秋筆法」對古典小說審美接受的影響〉，《信陽師範學院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28卷第3期（2008年6月），頁126。又王憲明：〈真假有無與「借事明義」——兼論索隱派〉亦謂《紅樓夢》運用了「借事明義的表述方式。這種表述方式，作俑於《春秋》」參《紅樓夢學刊》1997年第4輯（1997年），頁143。

<sup>11</sup> 參陳維昭：〈「自傳說」與本事注經模式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，2003年第4輯（2003年），頁17。

<sup>12</sup> 同註8，頁42。又孫玉明《紅學：1954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，2003年）也有相同的說法，見頁236。此外尚有不少學者強調索隱有探尋「微言大義」的企圖，如顧友澤云：「索隱派的產生，有著堅實的文化傳統。首先是西漢以來的解經思維……，透過著作表面的字義，深求其背後微言大義」，同註9，頁39；又齊學東亦說索隱派「在研究小說時專注於探求隱藏在小說作者與故事情節背後的本事，以便據此闡釋小說文本的『微言大義』」，〈索隱派的舊版翻新——評「劉心武揭秘《紅樓夢》」〉，《福建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6年第3期（2006年），頁127。

<sup>13</sup> 參註12所引陳維昭文。

<sup>14</sup> 參錢穆：《莊子纂箋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1993年），頁130、頁227、頁228和頁277。

理解，如《禮記·經解》便有「溫柔敦厚，《詩》教也」、「屬辭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」之說，<sup>15</sup>後來朱熹亦提到「聖人之言，在《春秋》《易》《書》無一字虛；至於《詩》，則發乎情，不同」，<sup>16</sup>可見二書在經學史上各有自身的位置。過去錢鍾書嘗辨析《詩》喻與《易》象的異同，<sup>17</sup>我們認為《詩》的比興和《春秋》的微言，同樣體現了不盡相同的詮釋方法和取向，不能隨便混為一談。

要確切地說明傳統經學對索隱範式的實際影響，不能僅僅滿足於一些大而化之、籠統模糊的論述，而應從學術觀念和研究方法的高度著眼，釐清有關問題。由於蔡元培嘗用索隱方法研究《紅樓夢》，又與胡適作過正面交鋒，闡述其研究方法，<sup>18</sup>理論與實踐兼備，因此本文會以他的著作為中心，考察索隱派紅學與傳統經學的關係。文章首先會回顧源出《春秋》學此一之流行說法，檢討其不足之處，繼而闡明《詩經》傳箋之學對蔡元培紅學的詮釋取向以及操作方法的影響，藉此揭示索隱範式的經學淵源。

## 二、源出《春秋》學的不足之處

不少學者認為索隱紅學可溯源至傳統《春秋》學，他們的見解雖有不同的側重點，但大體上可以歸納為「微言」和「筆法」兩大類。以下茲逐一檢討這兩種說法的根據及其合理程度。

### （一）今文學者微言大義的詮釋方法

受到小說與稗史同源一類說法的影響，<sup>19</sup>傳統學者經常把隱含在小說文字背後的意義類比為《春秋》的微言大義。《石頭記》戚本序言便謂此書「如《春秋》之有微詞，史家

<sup>15</sup> 鄭康成：《禮記鄭注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639。

<sup>16</sup> 朱熹：《朱子語類》，見朱傑人等主編：《朱子全書（修訂本）》第17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2778。

<sup>17</sup> 錢鍾書：《管錘編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），頁11-12。

<sup>18</sup> 蔡元培在1922年撰寫的〈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〉便明確標出「對於胡適之先生《紅樓夢考證》之商榷」此一副題。他在該文曾明確地指出自己所用的推求方法，包括「一、品性相類者；二、軼事有徵者；三、姓名相關者」（見蔡元培：《石頭記索隱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8年，頁1），可見他在方法論上確有一定的自覺。

<sup>19</sup> 陳廣宏〈小說家出於稗官說新考〉對這個命題有頗詳細的回顧和探討，見氏著《文學史的文化敘事——中國文學演變論集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19-38。

之多曲筆」，並感嘆謂「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、腐遷乎？」<sup>20</sup>這類牽合史傳、強調微詞的評論相當普遍，犀脊山樵、訥山人等人的序言都有類似說法，<sup>21</sup>孫渠甫甚至逕以「微言」命名其論《紅樓夢》的著作。<sup>22</sup>微詞、微旨之說不僅見於清代一般讀者的評論，與《紅樓夢》作者關係密切的脂硯齋同樣有類似的批語。甲戌本《紅樓夢》第八回「早知日後閒爭氣，豈肯今朝錯讀書」句，脂批曰：「這是隱語微詞，豈獨指此一事哉」，<sup>23</sup>足證此說多少反映了那個時代共同的詮釋取向。

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，著名紅學家俞平伯在《讀〈紅樓夢〉隨筆》中，仍相當重視微言大義之說，認為此書的寫法「在中國文學裏可謂史無先例，除非拿它來比孔子的《春秋經》」，<sup>24</sup>又說：

《紅樓夢》本身也另有一種情形必須一表的，即有過多的微言大義。引言中曾拿它來比《春秋經》，讀者或未必贊成，不過我確是那樣想的。<sup>25</sup>

這番話的份量與前引清人諸說大不相同，因為在一些學院派紅學家眼中，清代評論《紅樓夢》的著述雖多，「但其性質均不外乎隨感、議論、欣賞、讚嘆，也與學術性研究根本有別，難以牽合」，因此學術的「紅學」仍當以「胡適作《紅樓夢》考證為始」。<sup>26</sup>俞平伯是首批響應胡適的新紅學家，以科學的考證方法研治小說，他這種「微言大義」說雖然曾在某一時期被視為「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一種表現」，<sup>27</sup>但多年以後，仍然在學界有一定的影響力。

陳維昭便認同《紅樓夢》的微言大義說，還進而把它與今文經學扯上關係：

紅學中的索隱派接近於西漢今文學，以深求「微言大義」為宗旨。……以胡適為代表的考證派或「探佚派」則無疑繼承經古文學的傳統。<sup>28</sup>

<sup>20</sup> 戚蓼生：〈石頭記序〉，見一粟編《紅樓夢卷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，頁27。

<sup>21</sup> 犀脊山樵〈紅樓夢補序〉云：「稗官者流，卮言日出，而近日世人所膾炙於口者，莫如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其詞甚顯，而其旨甚微，誠為天地間最奇妙之文」；訥山人〈增補紅樓夢序〉則曰：「《紅樓夢》一書，不知作自何人……。顧其旨深而詞微，具中下之資者，鮮能望見涯岸，不免墮入雲霧中，久而久之，直曰情書而已。同註20，頁50, 53。

<sup>22</sup> 同註20，頁265-266。

<sup>23</sup> 俞平伯輯：《脂硯齋紅樓夢輯評》（香港：太平書店，1979年），頁138。

<sup>24</sup> 同註4，頁637。

<sup>25</sup> 同註4，頁764-765。

<sup>26</sup> 周汝昌：〈還「紅學」以學——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（重點摘要）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第4期（1995年），頁38。

<sup>27</sup> 參余冠英：〈是「微言大義」呢，還是穿鑿附會？〉，《人民文學》，1955年1月號（1955年1月），頁92-96。

<sup>28</sup> 同註8，頁42。

這裏他還只是審慎地說索隱派「接近」今文經學，但數年後他便直接表明索隱紅學乃指「蔡元培先生等運用今文經學方法所進行的《紅樓夢》研究」，<sup>29</sup>或者反過來表示「索隱方法是今文經學的基本方法」。<sup>30</sup>至於這種方法的具體內容，則包括「章句之學和訓詁學」，<sup>31</sup>以及「對古書、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其『本事』（原本事件）的關係的考證」。他聲稱：「古文經學方法是一種考證方法，今文經學方法同樣是一種考證方法」，<sup>32</sup>並把這種觀點寫進他的紅學史著作中。<sup>33</sup>

對那些好用二元對立方式思考的人來說，這番說法無疑有其吸引力，因為新紅學的確與版本、校勘等考據方法有密切的關係，加上胡適本人亦時常強調自己「對《紅樓夢》最大的貢獻，就是從前用校勘、訓詁、考據來治經學史學的，也可以用在小說上」，<sup>34</sup>即「用乾、嘉以來一班學者治經的考證訓詁的方法來考證最普遍的小說」。<sup>35</sup>胡適既然自信新紅學繼承了乾、嘉考證之學，要是蔡元培的索隱紅學方法同樣能夠與今文經學扯上關係，那麼新、舊紅學的對立便可重新表述為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對立了。從理論完整性的角度著眼，這種說法不但令新、舊紅學的對立旗幟更為鮮明，還可上通源遠流長的經學傳統，當然甚為吸引。難怪一些紅學專家前邪後許，倡言「如果說胡適的治學方法屬於『古文家』，那麼紅學索隱派的治學方法則恰恰來自『今文家』」。<sup>36</sup>

至此，索隱紅學與微言大義的關係，已由原來的隨筆偶感轉化為嚴肅的學術討論，並且與今文經學扯上關係，成為與古文經學相對的研究方法。然而，這類說法雖然看似完備，卻經不起嚴格的推敲，因為索隱紅學與今文經學無論在研究取向還是操作方法上，皆是異多於同，把二者牽合起來，並不見得能夠增進大家對索隱紅學範式的理解。<sup>37</sup>要展示問題的關鍵，有必要先簡單考察「微言大義」一詞的涵義和流變。

<sup>29</sup> 陳維昭：〈考證與索隱的雙向運動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1998年第4輯（1998年），頁180。

<sup>30</sup> 陳維昭：〈索隱派紅學與互文性理論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2001年第2輯（2001年），頁279。

<sup>31</sup> 同註8，頁42。

<sup>32</sup> 同註29，頁183。

<sup>33</sup> 同註3，參陳維昭：《紅學通史》，頁115。

<sup>34</sup> 同註3，參陳維昭：《紅學通史》，頁3652。

<sup>35</sup> 參胡適1961年5月6日的談話，見胡頌平編：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4年），第10冊，頁3561。

<sup>36</sup> 孫玉明：《紅學：1954》，同註12，頁236。

<sup>37</sup> 陳說發表後，王平曾提出商榷的意見，參王平：〈也談「索隱派」與「考證派」——兼與陳維昭兄商榷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2004年第3輯（2004年），頁184-199。陳維昭不久亦撰文回應，參陳維昭〈索隱、考證與「新紅學」的本質——答王平兄兼論紅學史諸問題〉，《洛陽師範學院學報》2005年第3期（2005年），頁76-80。可惜王、陳辯論的重點是索隱是否有資格稱為考證，沒有涉及本文討論的索隱範式的淵源問題。

「微言」有廣、狹二義，廣義的微言泛指隱含深意奧義的言詞，如《後漢書·光武十王列傳》云：「楚王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」；<sup>38</sup>狹義的微言則主要針對孔子所傳的學說。考這個詞語最初出現之際，即與孔子有關，《呂氏春秋·審應覽》云：「白公問於孔子曰：『人可與微言乎？』」<sup>39</sup>句中微言泛指隱密之言，雖非出自孔子之口，卻是白公問孔子之語。<sup>40</sup>據現存典籍，劉歆是最早把「微言」與「大義」連結起來的人，他在〈移書讓太常博士〉云「夫子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卒而大義乖」，<sup>41</sup>其後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亦曰：「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」，<sup>42</sup>於是「微言」逐漸演變為專指孔子所傳「大義」的「精微要妙之言」。<sup>43</sup>到了清代，隨著今文經學的復興，孔門狹義的微言大義與《春秋公羊傳》的關係更形緊密。

莊存與為清代常州今文經學的先導者，阮元〈莊方耕宗伯經說序〉稱其學「不專專為漢宋箋注之學，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外。」<sup>44</sup>句中「微言大義」與「語言文字」之學並列對舉，標識出此派有別於乾嘉漢學的特徵，頗為後世學者所稱引。<sup>45</sup>其後經學史和學術史論著大抵沿襲此說，如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云：「前漢今文說，專明大義微言；後漢雜古文，多詳章句訓詁」，「若嘉、道以後，講求今文大義微言，並不失之於瑣」。<sup>46</sup>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亦謂莊存與《春秋正辭》「刊落訓詁名物之末，專求所謂「微言大義」者，與戴、段一派所取途徑，全然不同。」<sup>47</sup>此後學者論及清代今文學時，例必標舉「微言大義」一語，<sup>48</sup>令此語儼然成為該學派的口號。<sup>49</sup>

<sup>38</sup> 范曄：《後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，頁1428。

<sup>39</sup> 許維通：《呂氏春秋校釋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5年），卷18，頁10。

<sup>40</sup> 同前註，許維通釋曰：「微言，陰謀密事也。」卷18，頁10。

<sup>41</sup> 劉歆：〈移書讓太常博士〉，見蕭統輯，李善注《文選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71年），頁602。

<sup>42</sup> 班固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），頁1701。

<sup>43</sup> 參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「昔仲尼沒而微言絕」句下注文。同前註，頁1701。

<sup>44</sup> 顏建華：〈阮元《研經室集》集外文輯佚〉，《湖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5年第19卷第5期（2005年），頁81。

<sup>45</sup> 如魏源〈劉禮部遺書序〉便以「微言大義」概括西漢今文學的特色：「西漢微言大義之學墜于東京，東京典章制度之學絕于隋、唐。」見《魏源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6年），頁242。

<sup>46</sup> 皮錫瑞著，周予同注釋：《經學歷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），頁89-90，347。

<sup>47</sup> 梁啟超著，朱維錚校注：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61。

<sup>48</sup> 類似例子不勝枚舉，這裏僅以兩部成書時代不同、學術立場亦迥異的著作為例，以供隅反。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稱劉逢祿之學「又主微言大義，撥亂反正，則承其外家之傳緒」，頁528；又侯外廬：《中國思想史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第五卷云：「今文學和古文學的區別，大體上是今文學家主微言大義，而古文學家主分析文義」（頁628），二者均以「微言大義」一語，標示清代今文經學的特色。

<sup>49</sup> 錢玄同當時亦注意到：「至於『微言』『大義』，本是兩詞，近人合為一詞，謂凡今文經說，專務發揮微言大義，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發揮微言大義之責自承。」見〈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〉，收於顧頡剛編：《古史辨》第5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97。

從前述廣義的角度看，說索隱派致力發掘《紅樓夢》的微言大義，並不見得有甚麼問題，因為索隱派的確不滿足於《紅樓夢》表層的字面意思，企圖探索隱藏在字裏行間的隱微深意，所以清代評論家的表述雖然並不精確，大體上仍屬穩當。然而要是從狹義的角度著眼，把「微言大義」與今文經學的學術範式聯繫起來，認為蔡元培等人亦運用了今文經學的方法研究《紅樓夢》，則難免有牽強比附之虞。因為今文經學所謂微言大義，自有其學術旨趣和研究方法，與索隱研究大異其趣，不容隨便混為一談。

學界公認「今文學之中心在《公羊》」，<sup>50</sup>而「清代今文學復興的出發點是《春秋公羊傳》」。<sup>51</sup>在經學史上，今文學家所理解的微言大義，並非泛泛之稱，而是針對孔子的學說而發，與《公羊傳》對《春秋》經文的解讀尤有莫大的關係。被尊為公羊先師的孟子，<sup>52</sup>嘗謂孔子因世衰道微，懼而「作《春秋》」；<sup>53</sup>又謂《春秋》「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『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』」<sup>54</sup>漢代學者亦普遍接受《春秋》為孔子所作，<sup>55</sup>經中隱藏了聖人所「竊取」的素王微義，如趙歧注曰：「孔子懼王道遂滅，故作《春秋》。因魯史記，設素王之法」，<sup>56</sup>又云：「孔子自謂竊取之，以為素王也。」<sup>57</sup>今文學家信奉此說，認為《春秋》諸傳之中，尤以《公羊傳》最能闡發孔子的微言大義，如清末今文學者皮錫瑞便說：「綜而論之，《春秋》有大義，有微言……。為《公羊》兼傳大義微言，《穀梁》不傳微言，但傳大義。」<sup>58</sup>可見《春秋》的微言大義實有其獨特的指稱，「所謂大義者，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是也；所謂微言者，改立法製以致太平是也」。<sup>59</sup>用現代學者的話來說，公羊學乃是一種「實踐儒學」、「外王儒學」，是有別於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一類強調內在心性的儒家。<sup>60</sup>

與宋明儒者以及同時代的考證學家不同，清代今文學家致力抉發隱藏在《春秋》經文之內的深義，探尋孔子所寄寓的教誨和理想，並且嘗試把這些見解套用至其他經典之中，

<sup>50</sup> 同註 47，頁 61。

<sup>51</sup> 周予同著，朱維錚編：《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（增訂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19。另參侯外廬《中國思想史》第五卷：「晚清今文學的興起，其始亦以『公羊』為中心」（頁 631）及朱維錚〈晚清的經今文學〉：「清代的經今文學，是以回到西漢中葉出現的《春秋公羊傳》的研究為開端的。」見朱維錚：《中國經學史十講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2 年），頁 164。

<sup>52</sup> 孟子與公羊學的關係，可參蔣慶：《公羊學引論》（沈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74-78。

<sup>53</sup> 焦循：《孟子正義·滕文公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 年），頁 452。

<sup>54</sup> 焦循：《孟子正義·離婁下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 年），頁 574。

<sup>55</sup> 參錢穆：《孔子與春秋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八冊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4 年），頁 267-276。又近人對孔子與春秋之關係的看法，林義正嘗作出清晰而精簡的介紹，參林氏著《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》（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2003 年），頁 1-15。

<sup>56</sup> 同註 53，頁 452。

<sup>57</sup> 同註 534。

<sup>58</sup> 見皮錫瑞：《經學通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），卷 4，頁 19。

<sup>59</sup> 同前註，卷 4，頁 1。

<sup>60</sup> 同註 52，頁 31-36，45-58。

形成獨樹一幟的學風。如莊存與的外孫劉逢祿除了撰寫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外，亦曾注解《論語》。他把「學而時習之」一章中的「傳」字解為「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」等，<sup>61</sup>以《公羊》之說詮釋《論語》，正可體現今文學以《公羊》為中心的說法。除了像一般箋注家那樣訓釋古代名物、字詞外，<sup>62</sup>公羊學者在詮釋《春秋》經文時，還有一套針對微言大義的解讀策略。

據許雪濤的研究，《公羊傳》主要從《春秋》經文表達的細微變化入手，探尋奧義，「如史法不當書者，而《春秋》書之；習慣上不當言者，而《春秋》言之；史實如此者，而《春秋》變文改之」。<sup>63</sup>也就是說，《公羊》傳的解經方法乃從《春秋》經文與史法、習慣或是史實相違之處，推斷孔子寄寓的心意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《春秋·莊公三十年》云：「秋，七月，齊人降鄆」，《公羊傳》云：

鄆者何？紀之遺邑也。降之者何？取之也。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？為桓公諱也。外取邑不書，此何以書？盡也。<sup>64</sup>

傳文透露，若依一般的歷史書寫習慣，這條資料至少有兩種處理方法：(1)應該刪去，因為國外佔領城邑之事，不必書於史策；(2)若要記述，亦應寫作「秋，七月，齊人取鄆」，以明史實。《春秋》最後沒有採用這兩種較為常見的寫法，必要深意存焉，後世注家的任務，正是要探究孔子如是書寫的用心。東漢何休認為「此何以書」表示「惡其不仁之甚也」，「為桓公諱也」則是「時霸足以除惡，故為諱言」；<sup>65</sup>前者解答了孔子不刪此條的原因，後者則道出用「降」而不用「取」的理據。何休把孔子的書寫原則加以歸納，得出五始、三科、九旨、七等、六輔、二類等條例。<sup>66</sup>其中「三科九旨」之說尤為影響深遠，甚至有所謂「無三科九旨則無《公羊》，無《公羊》則無《春秋》」之說，<sup>67</sup>啟發了晚清一眾講求通經致用的學者。<sup>68</sup>

<sup>61</sup> 見劉逢祿：《論語述何》，載嚴靈峯編：《無求備齋論語集成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年），第222冊，頁1-2。

<sup>62</sup> 參許雪濤：《公羊學解經方法：從〈公羊傳〉到董仲舒春秋學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39-54。

<sup>63</sup> 同前註，頁33。又書中對這些方法另有詳細說明，參頁54-90。

<sup>64</sup> 以上經傳原文，俱見徐彥：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9年），頁109。

<sup>65</sup> 同前註，頁109。

<sup>66</sup> 見「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」句下疏文，同註64，頁7。

<sup>67</sup> 語見劉逢祿《春秋論下》，載《劉禮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卷3，頁20。另見於魏源：《公羊春秋論下》，《魏源集》同註45，頁133。

<sup>68</sup> 《公羊學》在清代的發展和演變，可參陳其泰：《清代公羊學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7年）及孫春在：《清末的公羊思想》（臺灣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）的相關章節。

從以上描述可知，今文經學的研究範式與索隱紅學實有明顯的差異。就詮釋的取向而言，索隱學者試圖從「滿紙荒唐言」的虛構敘述中，解讀出他們認為作者刻意隱去的歷史事實。如蔡元培從小說「絳珠草長於靈河岸上」此一想像出來的情節，連類到「竹坨生於秀水」一事，<sup>69</sup>這是一個由虛而實的詮釋過程，與今文學者解讀《春秋》的方向剛好相反。公羊學家主要通過玩索經文的歷史記述，尋繹出孔子的道德教訓，用傳統的話來說，他們的工作屬於「借事明義」，即透過具體的史實闡明抽象的大義，<sup>70</sup>由實返虛。表面看來，他們與索隱派學者一樣關注史實記載，然而對公羊學者而言，詮釋經文的最終目的是大義，歷史記述只是研究的對象和手段，但在索隱研究中，歷史本事卻是研究的目的和成果。

研究方法方面，今文學者主要從《春秋》經文與一般史法相違之處入手，從中抉發孔子選擇某一特定寫法的用心。這種方法背後隱含了一個預設，那就是歷史記述有一種「正常的」、「應然的」書寫方式。如上引《春秋·莊公三十年》的「秋，七月，齊人降鄆」，若採用正常寫法，這一條材料應該不存在，或應作「秋，七月，齊人取鄆」。魯國原來的史書《魯春秋》（又稱《不修春秋》），原則上應是採取這類「正常」的書寫模式。今文學者相信孔子正是通過對《魯春秋》的筆削改動，帶出自己的觀點。基於此一信念，晚清康有為甚至嘗試逐一還原「魯史原文」、「孔子筆削之稿」和「已修《春秋》」三種文本，認為前述莊公三十年秋七月的記載，本來應作「秋，七月，齊侯取紀之鄆，盡紀邑」。<sup>71</sup>由是而言，公羊學者並不是漫無指向地解讀經文，而是以標準的史法書寫為參照系，從經文變更成法之處，解讀筆削的深義。

倘若蔡元培運用了今文學者的治學方法，他在展開索隱研究之前，腦海裏應預先存有一種正常的、標準的小說書寫模式，然後比對《紅樓夢》的寫法，再據二者相異之處解讀出作者隱藏的本意。可是事實上他並沒有這樣做，而是以徐時棟的說法為起點，推衍其釋讀方法，尋繹出小說中的歷史故實。《石頭記索隱》始刊於1916年，但早在1896年，蔡元培已在日記中提到其研究的基點乃《郎潛筆記》所引徐柳泉之說。<sup>72</sup>二十年後他在《石頭記索隱》中再明言「闡證本事，以《郎潛紀聞》所述徐柳泉之說為最合」。<sup>73</sup>為了回應胡適「笨猜謎」的指摘，<sup>74</sup>他在該書第六版自序重申：「余之為此索隱也，實為《郎潛二筆》

<sup>69</sup> 同註 18，頁 15。

<sup>70</sup> 參胡楚生：〈試論《春秋公羊傳》中「借事明義」之思維模式與表現方法〉，《中興大學文史學報》第 30 期（2000 年 6 月），頁 1-31。

<sup>71</sup> 見康有為：《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（上）》，載蔣貴麟主編：《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（七）》（臺北：宏業書局，1976），頁 278。

<sup>72</sup> 蔡元培：《日記》1896 年 6 月 17 日，《蔡元培全集》（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8 年）第 15 卷，頁 81。

<sup>73</sup> 同註 18，頁 7。

<sup>74</sup> 同註 2，頁 437。

中徐柳泉之說所引起」，<sup>75</sup>並且系統地整理出徐時棟所運用的推求方法，包括：「一、品性相類者；二、軼事有徵者；三、姓名相關者。」<sup>76</sup>他的索隱方法和研究取向，與今文學者解讀微言大義的方式實在有很大的距離。

## （二）春秋筆法的解讀層次

《紅樓夢》是今天公認的文學經典，當然沒有必要比附傳統經學，但在小說未登大雅之堂的時代，評論家為了抬高小說的地位，每以「春秋筆法」形容小說的寫法，如金聖嘆批《水滸傳》第四十九回時便指出當中運用了「《春秋》為賢者諱」的筆法。<sup>77</sup>脂硯齋批閱《石頭記》時，同樣注意到文字背後的隱諱意思，如第八回「生的形容嫵娜，性格風流」句，甲戌本批曰：「四字便有隱意，《春秋》字法」；第四十五回「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裏幫忙」句，庚辰本批曰：「自忙不暇，又加上一幫字，可笑可笑。所謂《春秋》筆法」；又同段「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」諸句，庚辰本批曰：「不寫阿獸兒，已見阿獸兒終日醉飽優遊，怒則吼，喜則躍，家務一概無聞之形景畢露矣。《春秋》筆法」。<sup>78</sup>當中提及《春秋》筆法或字法，正是來自傳統的《春秋》學。

《春秋》以簡約的文詞寄寓深微的意義，過去學者把這種獨特的寫作手法概稱為「春秋筆法」、「春秋書法」、「義法」或「義例」。<sup>79</sup>《左傳·成公十四年》記君子曰：「《春秋》之稱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，懲惡而勸善，非聖人，誰能修之？」<sup>80</sup>晉代的杜預發揮此說，提出著名的「五例」（又名「五事」或「五情」）說，<sup>81</sup>對《春秋》筆法作出經典的闡述。錢鍾書認為五例可分為兩類：「就史書之撰作而言，『五例』之一、二、三、四示載筆之體，而其五示載筆之用。」<sup>82</sup>「載筆之體」的前四例，意思相

<sup>75</sup> 同註 18，頁 1。

<sup>76</sup> 同註 18，頁 1。

<sup>77</sup> 金聖嘆於《水滸傳》第四十九回批曰：「宋江軍馬四面齊起，而不書正北，當是為廷玉諱也。……《春秋》為賢者諱，故缺之而不書也」，末後還特別強調：「嗚呼，一樂廷玉死，而用筆之難至於如此，誰謂稗史易作，稗史易讀乎耶」，把稗史與《春秋》的用筆連類並舉。見施耐庵著，金聖嘆評點，文子生校點：《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》（河南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 806。又第六十回亦云：「夫李固之所以為李固，燕青之所以為燕青，娘子之所以為娘子，悉在後篇，此殊未及也。……《春秋》於定、哀之間，蓋屢用此法也。」頁 973。（河南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。

<sup>78</sup> 以上引文分別見俞平伯輯：《脂硯齋紅樓夢輯評》，同註 23，頁 137 及 445。

<sup>79</sup> 參蕭鋒：〈從「春秋書法」到「春秋筆法」名稱之考察〉，《北方論叢》2009年第2期（2009年），頁 10-13。

<sup>80</sup> 孔穎達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 879。

<sup>81</sup> 同前註，頁 21-23。單周堯對這一段文字有細緻的申述，參單氏著：〈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序》五情說補識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2010年第20卷第4期（2010年），頁 79-119。

<sup>82</sup> 同註 17，頁 162。

當接近：「『微』、『晦』、『不汙』，意義鄰近，猶『顯』、『志』、『成章』、『盡』也。」<sup>83</sup>杜預把「婉」解作「曲也。謂屈曲其辭，有所辟諱」，<sup>84</sup>是則婉字與微、晦、不汙同樣「意義鄰近」。由是而言，《春秋》筆法包括兩個要點：(1)通過簡約隱晦的文詞，更有效地展現事實和意義（載筆之體），(2)藉此帶出勸善懲惡的褒貶效果（載筆之用）。

《春秋》筆法對古代敘事文本的深遠影響，學界已有公論。<sup>85</sup>從脂硯齋的評點可見，《紅樓夢》的敘述亦有一些地方與《春秋》筆法相合。近年陳才訓即嘗試從敘事藝術和審美接受等不同方面，具體分析《春秋》筆法對《紅樓夢》的影響，包括小說的敘事謀略和人物塑造，<sup>86</sup>以及尚簡用晦的修辭手法等。<sup>87</sup>然而值得思考的是，縱然《紅樓夢》運用了《春秋》筆法，但解讀這種筆法的方法，是否等於索隱紅學的研究模式？對於這個問題，陳維昭持肯定的態度。他認為：

本事考證也就是索隱。……《紅樓夢》的局部實錄的寫作方法直接繼承了「春秋筆法」。在中國的傳統學術中，對春秋筆法的解讀方法之一則是「本事注經方法」。<sup>88</sup>

他聲言索隱紅學運用了「本事注經」的方法，並由此泯滅新、舊紅學的界線：

紅學史上一切的他傳說與自傳說（史學實錄意義上）都是在從事「本事考證」工作，也都是一種索隱紅學。<sup>89</sup>

其說很快引起商榷的意見，王平特撰文指出索隱不能算是考證，因為「索隱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隨意性，與考證方法的重證據、重推理截然不同」。<sup>90</sup>不過有趣的是，他也沒有否

<sup>83</sup> 同註 17，頁 162。

<sup>84</sup> 同註 80，頁 879。

<sup>85</sup> 對於這個問題，王基倫：〈「《春秋》筆法」的詮釋與接受〉（見林慶彰，蔣秋華主編《經典的形成、流傳與詮釋》第一冊（臺灣：學生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 375-414），以及陳才訓：《源遠流長：論〈春秋〉〈左傳〉對古典小說的影響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第二章「『春秋筆法』對古典小說的浸潤」（頁 56-128）有頗詳細的討論。此外，李淵良亦就此發表了多篇論文，包括〈春秋筆法與中國小說敘事學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08年第6期（2008年），頁 38-42、〈春秋筆法：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技巧〉，《北方論叢》2008年第6期（2008年），頁 25-30等，並有以「春秋筆法的現代闡釋」為題的國家社科基金專案（編號：04BZW016）。

<sup>86</sup> 參陳才訓：〈含蓄暗示與客觀展示——論「春秋筆法」對《紅樓夢》敘事藝術的影響〉，《西華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8年第4期（2008年），頁 6-10。另參石昌渝：〈春秋筆法與《紅樓夢》的敘事方略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2004年第1輯（2004年），頁 142-158。

<sup>87</sup> 參陳才訓：〈「春秋筆法」與《紅樓夢》審美接受〉，《吉首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8年第29卷第1期（2008年），頁 115-118。

<sup>88</sup> 同註 11，頁 14-17。

<sup>89</sup> 同註 11，頁 14。

<sup>90</sup> 同註 37，王平：〈也談「索隱派」與「考證派」——兼與陳維昭兄商榷〉，頁 186。

定索隱紅學與本事探究的關係，只是不同意陳氏「把是『考證』性質的東西說成是考證，然後再說這種『考證』與索隱毫無二致」而已。<sup>91</sup>陳維昭所理解的本事注經法，乃指「由於一些小說採用了獨特的方式去偽裝歷史事實，於是，挑明『本事』就成為小說批評者的一個重要任務」。<sup>92</sup>過去經學家以歷史事實解讀《春秋》筆法，而索隱派紅學家則以歷史事實解讀小說情節，因此他相信二者有承襲的關係。

回顧《春秋》的詮釋傳統，陳氏的本事注經說也有一定的依據。《春秋》文字簡約，因此三傳在解釋經文時，都會補敘歷史事實，以明當中筆削褒貶之義。據趙生群的統計，《左傳》與《春秋》對應的條目約有1300條，其中絕大多數條目俱屬史實的敘述。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則各有近570條和750條，當中較為具體地以史事解經者，《公羊傳》有50餘條，《穀梁傳》僅佔30餘條。<sup>93</sup>《左傳》比《公》、《穀》更著重敘事，前人對此有相當清晰的理解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早謂丘明「論本事而作傳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。」<sup>94</sup>葉夢得則以為「《左氏》傳事不傳義」，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傳義不傳事」<sup>95</sup>朱熹更進一步指出「《左氏》所傳春秋事，恐八九分是」，而較《公》、《穀》之事則「多出揣度」。<sup>96</sup>《左傳》以史事說經，正是「本事注經」說的範例。然而，索隱派紅學是否真的運用了這種解讀《春秋》筆法的本事注經法？經過認真的考量，本文認為這種說法仍然缺乏足夠的根據。

首先要指出的是，對《春秋》筆法的解讀不能與本事注經劃上等號，二者之間實無必然的關係。細閱相關著作，學者解讀《紅樓夢》的《春秋》筆法時，鮮有運用《左傳》的本事注經法；同樣，索隱紅學雖然考索小說背後的歷史本事，但這類探索亦非為書中的《春秋》筆法而發。脂硯齋的批語因曾點出《紅樓夢》運用《春秋》字法之處，同時透露作者的家世和小說所寫的某些本事，<sup>97</sup>令人覺得二者似乎有特定的關係，這裏不妨由他的批語入手，剖析問題所在。

春秋筆法強調在客觀敘述中寓以褒貶，這種寫法的要義之一就是「筆削」。石昌渝指出：「《紅樓夢》之筆削，最突出也是最著名的例子是關於秦可卿之死的敘述。」<sup>98</sup>從脂硯齋的批語可見，秦可卿之死涉及隱密之事，曾經作者刪削。第十三回庚辰本總批云：

<sup>91</sup> 同前註，頁191。

<sup>92</sup> 陳維昭：〈《石頭記》脂評與傳統的本事注經方式〉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2003年第3期（2003年），頁110。

<sup>93</sup> 趙生群：《〈春秋〉經傳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272。

<sup>94</sup> 同註42，頁1715。

<sup>95</sup> 葉夢得：《葉氏春秋傳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影四庫全書本，第149冊，頁3。

<sup>96</sup> 同註16，朱熹：《朱子語類》，第17冊，頁2840。

<sup>97</sup> 參馮其庸：《石頭記脂本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4-25。

<sup>98</sup> 同註86，頁150。

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，是大發慈悲心也，嘆嘆。<sup>99</sup>

甲戌本總批云：

秦可卿淫喪天香樓，作者用史筆也。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，嫡（的）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者，其事雖未漏，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，姑赦之，因命芹溪刪去。<sup>100</sup>

甲戌本眉批云：

此回只十頁，因刪去天香樓一節，少却四五頁也。<sup>101</sup>

大凡討論《紅樓夢》與《春秋》筆法關係的學者，幾乎都會引用這個例子。<sup>102</sup>這些批語顯示，《紅樓夢》本文並沒有完整地展示秦可卿之死的事實，而是通過情節上的刪減，帶出作者對事件的態度，這與《春秋》筆削、為親者諱等寫作手法，正相符合。然而要留心的是，脂批雖然點破作者以《春秋》筆法敘述秦可卿之死，卻與本事注解無涉。讀了脂硯齋的評語，讀者只知道作者刪去天香樓一節的因由（因命芹溪前去）、作者所寄寓的心情（大發慈悲心），以至曹府的一些家事（魂托鳳姐賈家後事），卻仍不知道小說中秦可卿之死被刪去的情節，更遑論知道這些情節背後的歷史本事。

脂硯齋雖然經常明示小說的情節「真有其事，經過見過」、「真有是語」、「是余舊日目睹親聞」，<sup>103</sup>卻從沒有補充或敘述這些事件的始末，更沒有以其親聞的事件解釋書中的史筆，與前述本事注經之法實不相侔。連直接參與《紅樓夢》創作過程的脂硯齋尚且如此，現代研究者在解讀《紅樓夢》的《春秋》筆法時，自然更無所憑藉，只能著眼於小說文字本身，從中尋繹作者隱晦地寄寓的意思。如李洲良相信《紅樓夢》有不少地方「運用『志而晦』的筆法」，其中劉姥姥就是明顯的例子：「曹雪芹寫村嫗劉姥姥三進賈府就是運用了「草蛇灰線，伏脈千里」的『春秋筆法』」。<sup>104</sup>為了說明這一點，他詳細地分析了小說中劉姥姥三進大觀園的情節。此外，石昌渝亦相信「筆與削寄托著作者褒貶，這個筆法可以說

<sup>99</sup> 同註 78，頁 169。

<sup>100</sup> 同註 78，頁 169。

<sup>101</sup> 同註 78，頁 169。

<sup>102</sup> 除前述石昌渝外，陳維昭、陳才訓和李洲良等均有引用這條例子。參陳維昭文，見註 92，頁 103；陳才訓，見註 86，頁 7；李洲良，見註 85，頁 28。

<sup>103</sup> 同註 23，頁 199、276 及 515。

<sup>104</sup> 同註 85 頁 27。

貫穿在對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描寫的始終」，<sup>105</sup>並且以文本細讀之法，大幅引用小說的敘述為證。然而，他們的解讀並無索隱研究的成分。由此可見，對《紅樓夢》《春秋》筆法的詮釋與本事索隱根本是兩回事，沒有必要因為索隱紅學涉及小說情節的歷史本事，即以為它受到傳統《春秋》學的影響。

事實上只要放棄先入之見，虛心閱讀蔡元培《石頭記索隱》，不難發現他的研究方法，與《春秋》筆法並無太大關係。這裏姑舉書中以史湘雲為陳其年的其中一項證據為例：

《墓誌銘》曰：「遇花間席上，尤喜填詞。興酣以往，常自吹簫而和之，人或指以為狂。其詞至多，累至千餘闕，古所未有也」傳曰：「所作詞尤凌厲光怪，變化若神，富至千八百首。」《石頭記》七十回「史湘雲偶填柳絮詞」，湘雲說道：「咱們這幾社，總沒有填詞，明日何不起社填詞。」與其年好為詞相應。<sup>106</sup>

文中先徵引史料，展現歷史人物的個性或事蹟，然後比對《紅樓夢》中類似的情節，這是索隱紅學最典型的考釋方法。蔡元培注意到史傳稱陳其年性好填詞、詞作至多，而史湘雲又恰好偶爾填詞，並曾建議起社填詞，二者的個性經歷頗相吻合，正可印證二人的關係。按照蔡元培的說法，《紅樓夢》中有關史湘雲填詞的情節不光只有字面上的意義，還另有所指，然而這類敘述手法與《春秋》筆法所強調的尚簡用晦、一字褒貶等，仍然有重要的差異，未可忽視。

從詮釋架構的角度看，索隱解釋其實預設了兩個敘述層次，一個是由小說文本想像出來的虛擬世界，另一個是由史傳文獻建構而成的歷史世界。索隱研究的主要工作，正是把這兩個世界連結起來，證明小說裏的角色、情節，與歷史上的人物、事件有著對應的關係。這兩個層次原則上互不從屬，各有獨立的發展空間，因為要是二者完全相同，小說就是史傳，也就沒有索隱的必要了。兩個敘述層次的區別，乃所有索隱研究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。然而解讀文學文本中所用的《春秋》筆法，則沒有必要作出相同的假設，因為嚴格而言，《春秋》筆法只涉及單一的敘述層次。要具體說明這類解讀與索隱研究的差異，不妨仔細看看近人剖析《紅樓夢》中《春秋》筆法的文字：

如二十二回賈母替寶釵做生日，她要寶釵點戲，寶釵點了一齣《西遊記》，賈母非常高興。然後王熙鳳點了一齣《劉二當衣》，賈母也是十分歡喜。……顯然作者在這裡以含蓄的「春秋筆法」來暗示寶釵之工於心計。第四十回「史太君兩宴大觀園，金鴛

<sup>105</sup> 同註 86，頁 151-154。

<sup>106</sup> 同註 18，頁 29。

鴛三宣牙牌令」，眾人因劉姥姥在宴席上的滑稽表現而笑態百出，作者惟妙惟肖地寫了湘雲、黛玉、寶玉、賈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媽、探春、惜春及眾侍女的笑態，可唯獨沒寫寶釵之笑，作者當然不是忘記了寶釵，而是有意為之。作者在這裏運用的是「春秋筆法」所慣用的「削筆」，是「意到而筆不到」的「不寫之寫」，它「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，捫毛而辨骨，睹一事於句中，反三隅於字外。」由此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寶釵確是一位穩重平和的封建淑女。<sup>107</sup>

文中提到《紅樓夢》運用了「比事」和「削筆」兩種《春秋》筆法，細緻地刻畫出寶釵的個性。這兩種筆法的表面意義和深層意義，可以表列如下：

筆法	表面意義	深層意義
比事之法	寶釵點戲	寶釵工於心計
削筆之法	不寫寶釵之笑	寶釵穩重平和

前者通過描寫寶釵點戲，暗示她工於心計；後者則以不寫之寫的方式，表現寶釵穩重平和的一面。然而無論寫還是不寫，這些論述仍屬同一敘述層次，字面上涉及的是寶釵行為，背後反映的則是寶釵的個性，沒有超越小說人物的層次，與索隱由小說延伸至歷史的做法迥然有異。

綜上所論，索隱與《春秋》學中的《公羊》學（今文學），以及《左傳》學（古文學）的詮釋預設和方法俱有本質上的差異。相較之下，蔡元培紅學無疑與《詩經》的箋釋傳統更為接近。

### 三、從《詩經》學到小說索隱的演化

蔡元培發表《石頭記索隱》後沒多久，顧頡剛已指出其說受到《詩經》刺詩詮釋的影響，此後個別學者亦間或指出索隱紅學與《詩》之比興及《離騷》香草美人的關係。然而，這些論述仍然十分簡略，為了清楚說明傳統《詩經》學與索隱紅學的關係，有必要從學術理念及研究方法兩方面，考察《詩經》傳箋之學對小說索隱的實際影響。

<sup>107</sup> 同註 86，頁 7。

### （一）《詩經》詮釋傳統的定向作用

以《毛傳》為基礎的《詩經》詮釋學，對後世文學批評有定向性的影響。<sup>108</sup>它對索隱紅學的啟示作用，可以分三個方面來說明。

#### 1. 以史證詩，轉虛為實

「詩史」一詞雖然於晚唐才出現，<sup>109</sup>但以史實詮釋詩歌的方法，早見於先秦對《詩》的解讀中。從《詩經》的內容看，歷史解讀的方向有其內在的根據，因為詩中本來便涉及不少史事，尤以《雅》、《頌》為甚，如〈玄鳥〉、〈長發〉、〈生民〉、〈公劉〉等，根本就是商、周的開國故事；其他如《國風》中的〈破斧〉、〈黃鳥〉、〈下泉〉等，亦明顯有其歷史根據。<sup>110</sup>而且從《詩》的結集編輯以及當時賦詩言志的材料可見，《詩經》除了有會盟燕享的儀式功能外，還有以詩明事的「史鑑」作用，希望聞者可以鑑古知今。<sup>111</sup>於是探尋史實內容及其諷諫義蘊，逐漸成為《詩經》詮釋的基本目標，至漢代更發展成完整的傳箋之學。

《毛傳》一直被《詩經》學者奉為圭臬，影響深遠，其〈小序〉即以事實釋證為主。單是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衛》三風提及的歷史人物便有衛頃公、衛莊姜、公孫文仲、衛宣公、黎侯、衛共伯、公子頑、衛宣姜、衛文公、衛懿公、衛武公、衛莊公、宋襄公、齊桓公等，其他泛稱的夫人、先君、國人、孝子、大夫、衛君、臣子、衛女之類，更是不在話下。<sup>112</sup>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毛傳》雖然以史證詩，直接道出相關的人名，但這些歷史人物鮮有出現在詩歌的原文中。如〈邶風·柏舟〉「我心匪鑿」與〈綠衣〉「我思古人」，都沒有點出「我」的身份，但〈序〉卻分別把他們坐實為衛頃公時的「仁人」和「衛莊姜」。<sup>113</sup>再如〈二子乘舟〉，全詩只有八句：

二子乘舟，汎汎其景。願言思子，中心養養。

二子乘舟，汎汎其逝。願言思子，不瑕有害。

<sup>108</sup> 關於《毛傳》的形成以及《序》與《傳》的關係，歷代有不同的爭議，但二者均屬毛亨之傳，仍是佔主流的說法。參程元敏：《詩序新考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5年），頁103-115。

<sup>109</sup> 關於「詩史」一詞的流變，可參張暉：《中國「詩史」傳統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2年）。

<sup>110</sup> 詳參潘秀玲：《〈詩經〉存古史考辨——〈詩經〉與〈史記〉所載史事之比較》（臺北：花本蘭文化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20-81。

<sup>111</sup> 參劉毓慶、郭萬金：《從文學到經學——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3-51。

<sup>112</sup> 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28-292。為了方便聚焦說明，以下主要圍繞這三卷與衛國有關的詩歌展開討論。

<sup>113</sup> 同註112，頁134, 138。

詩中「二子」屬泛稱，並非專有名詞，但〈小序〉認為他們就是衛宣公的兩個兒子公子伋和公子壽。<sup>114</sup>

《毛傳》的釋證與《春秋》以事證事的詮釋進路迥然有別，後者主要通過補敘史事，說明經文中筆削的意涵。如前所述，經文中的「鄭伯」與傳文的「鄭莊公」雖然褒貶義不同，卻仍屬同一敘述層次內的同一個人，沒有半點含糊之處。反觀《毛傳》對經文的解讀，卻有很大的詮釋空間，像〈邶風·柏舟〉中的「我」到底是「仁人」還是朱熹所說的「婦人」，這個問題聚訟千年，至今仍無結論。<sup>115</sup>《毛傳》轉虛證實，然而原文與解釋之間，仍然存在無法統一的裂縫。這種解釋上的張力，與索隱紅學的探究正相一致。

小說人物富有廣泛的象徵性，蔡元培卻嘗試把他們還原為歷史上的特定人物。早在1898年，他已得出初步的成果：

林黛玉（朱竹垞）	薛寶釵（高澹人）	
寶琴（冒辟疆）		
妙玉（姜湛園）	王熙鳳（余國柱）	
李執（湯文正）		
探春（徐澹園）	惜春（嚴藉舲）	元春
史湘雲（陳其年）	賈母（明太傅）	迎春
寶玉（納蘭容若）	劉老老（安三）	秋菱 <sup>116</sup>

他的索隱與《毛傳》一樣，不但指向歷史人物，同時不拘泥於性別。更重要的是，小說角色與歷史人物沒有必然的連繫，會隨解釋者的學養和視野而有所不同。蔡元培的說法固然有別於王夢阮等人的索隱，就是他本人前後期也有一些變化。在1896年，他還以為「寶琴是吳漢槎」，「劉老老當是沈歸愚」，但短短兩年間，二人已分別變為冒辟疆和安三了。<sup>117</sup>

## 2. 主題潛藏，表裏不一

不單歷史人物不見於詩歌中，《詩序》所揭示的全詩主旨及美刺取態，更是經常溢出於文字之外。如《毛傳》認為〈淇奧〉旨在「美武公之德」，但通讀全詩，只能找到那位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「君子」，原文中從來沒有顯示他與武公有任何關係。<sup>118</sup>主旨難以

<sup>114</sup> 同註 112，頁 209。

<sup>115</sup> 這個問題的過去與現狀，可參晁福林：〈讚美憂愁：論上博簡《詩論》關於《詩·柏舟》的評析〉，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8年第4期（2008年），頁60-67。

<sup>116</sup> 蔡元培：《日記》1898年7月27日，同註72，第15卷，頁187。

<sup>117</sup> 蔡元培：《日記》1896年6月17日，同註72，第15卷，頁81。

<sup>118</sup> 同註 112，頁 117。

捉摸，詩的美刺內涵同樣飄忽莫測。〈淇奥〉內容是歌頌君子，說它是美詩亦不難理解，但緊接下來的〈考槃〉同樣是歌頌的性質，讚美考槃為樂的「碩人」，《毛傳》卻說它是刺詩：「刺莊公也」。<sup>119</sup>這類不一致的解讀，難免啟人疑竇，令人覺得〈小序〉對〈考槃〉的解釋「似嫌牽強」，<sup>120</sup>但也有學者為舊說辯解云：「美賢者隱退，刺莊公不用賢，美在此而刺在彼，言內言外之意可合而一，《詩序》未為不通。」<sup>121</sup>言內言外之意或可合而為一，不一定互相抵觸，但《詩序》之說不在言內，卻是可以肯定的。

《詩經》的美刺與《春秋》的褒貶均與政治諷諭有關，且都意在言外，強調超越經文表面的意義，二者很容易令人混淆起來。然而《春秋》的褒貶都與實際的史事有關，只要比對經文（鄭伯）與其他記述（鄭莊公），即有可能推敲出褒貶的涵義和理由。而且《春秋》筆法預設了一種常規的史書寫法，作者正是因為背離了常態書寫（如《不修春秋》），才有可能在一字之中帶出褒貶。這些有意識的背離自成系統，因而亦有例可循，後世學者便歸納作不少條例，如《春秋集傳纂例》記「殺君」例云：「凡魯君見弑，止皆書薨，不可斥言也。他國公子篡，大夫弑，必書名，志罪也」，又「公薨」例云：「凡公薨，必書其所，詳內事，重凶變也。若遇弑，則不地。」<sup>122</sup>換而言之，《春秋》經文中的「弑」、「薨」等字都是帶有特殊意義的符碼（code），它們與其他語詞結合後雖可產生不同的涵義，但這些隱密的微旨仍可系統地破譯。

反觀《詩經》除少數史詩外，鮮會指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，很難找出與詩歌相對應的史實。加上詩中的文字多是局限於原詩之內的泛稱，各詩之間又無互文的關係，因而亦無法通過歸納的方式，獲得「君子」「碩人」等字詞與主題美刺之間的通例；反過來說，讀者亦無法從《詩序》所述各詩主旨中，找到詩歌內容或語詞的共同點。如〈小序〉以為〈綠衣〉、〈燕燕〉、〈日月〉、〈終風〉一連四首詩，均述衛莊姜事，但各詩提及的綠衣、燕子等都是含義廣泛的象徵（symbol），並無統一的符碼足以標示衛莊姜的身分。《詩序》的說法固然有其外在的根據，<sup>123</sup>但這種抽離本文的泛歷史化解釋很容易出現過度詮釋的問題，難怪朱熹批評《毛傳》間或「傳會書史，依託名諡，鑿空妄語，以誑後人」。<sup>124</sup>

主題與詩歌內容的鬆散關係，同樣見諸於索隱紅學中。蔡元培雖聲稱自己受到徐時棟的啟發而展開紅學索隱，但他沒有全盤接受徐氏對全書主題的理解。查《郎潛紀聞二集》「姜西溟典試獲咎之冤」條下略云：

<sup>119</sup> 同註 112，頁 259。

<sup>120</sup> 余正培：《詩經正詁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 年），頁 163。

<sup>121</sup> 陳子展：《詩經直解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3 年），頁 174。

<sup>122</sup> 陸淳：《春秋集傳纂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）影四庫全書本，第 146 冊，頁 478, 409。

<sup>123</sup> 參吳萬鍾：《從詩到經——論毛詩解釋的淵源及其特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 年），頁 94-102。

<sup>124</sup> 同註 16，朱熹：《詩序辨說》，第 1 冊，頁 361。

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：「小說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即記故相明珠家事。金釵十二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。」<sup>125</sup>

徐時棟相信《紅樓夢》所記實為明珠家事，對姜西溟的遭遇尤其同情。蔡元培雖然接受他對個別人物身份的解讀，卻認為：

《石頭記》者，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。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。書中本事，在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，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，寓痛惜之意。<sup>126</sup>

他與徐氏的意見不同，但二人所述主旨，均難以從原文中找到直接而又充分的證據。蔡元培把《紅樓夢》視為「揭清之失」的政治小說，與《毛傳》強調美刺諷諭的鮮明政治取向，倒是相當接近。

### 3. 尋繹細節，證成題旨

儘管索隱紅學所述本事和主旨，均溢出於文字之外，但學者在闡明己見時，都會在書中尋找根據，佐證其說。為了說明《紅樓夢》是政治小說，蔡元培指出：

書中「紅」字，多影「朱」字。朱者，明也，漢也。寶玉有「愛紅」之癖，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；好吃人口上胭脂，言拾漢人唾余也。……所謂賈府即偽朝也。其人名如賈代化、賈代善，謂偽朝之所謂化、偽朝之所謂善也。賈政者，偽朝之吏部也。賈敷、賈敬，偽朝之教育也。<sup>127</sup>

他以獨特的方法拆解書中象徵，揭示小說中的人物無論角色名字或行為習慣，都含政治的喻意，與全書主旨互相呼應。這類尋繹文本細節，歸宗於主題的做法，與《毛詩》的箋釋同出一轍。

〈衛風·柏舟〉「汎彼柏舟，亦汎其流」原文只謂柏舟在河上飄浮，但《毛傳》既認定此詩主旨為「仁人不遇」，汎流的含義便不是如此簡單，而是表示「不以濟渡」之意。鄭玄解釋說：「舟，載渡物者，今不用，而與物汎汎然俱流水中。興者，喻仁人之不見用，而與羣小並列」。<sup>128</sup>儘管馬瑞辰批評鄭氏誤解「亦」的用法，多添了「與羣小並列」，<sup>129</sup>但

<sup>125</sup> 陳康祺：《郎潛紀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404。

<sup>126</sup> 同註18，頁6。

<sup>127</sup> 同註18，頁7-8。

<sup>128</sup> 同註18，頁134。

<sup>129</sup> 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，頁107。

以舟未能載渡喻仁人不見用，基本上沒有甚麼異議。〈二子乘舟〉同樣取喻於汎舟：「二子乘舟，汎汎其景」，但其意並非無所見用，而是「涉危遂往，如乘舟而無所薄，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」，因為此詩的主題是「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。」<sup>130</sup>同樣是汎舟，卻會因應全詩主旨而有不同的解讀，可見主題一經確定，全詩的細節都要儘可能配合靠攏。

《詩經》原文中一些看似平平無奇的文字，經箋注家聚焦放大後，每每有意想不到的深意。如〈綠衣〉「綠兮衣兮，綠衣黃裏」，今人以為此純是睹物懷人之詩，詩中綠衣「既非妙喻，亦無深意」，<sup>131</sup>但《毛傳》指出：「綠，間色。黃，正色」，間色在外，正色在裏，正是「妾上僭，夫人失位」之意。<sup>132</sup>《傳》、《箋》好以禮解釋男女愛情詩，<sup>133</sup>綠衣的涵義一經點明，似乎亦言之有理。然而，箋注家過分重視細節與主旨之間的融貫，間或予人牽強之感。如〈匏有苦葉〉首章云：「匏有苦葉，濟有深涉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」。鄭玄認為前兩句暗指時間：「瓠葉苦而渡處深，謂八月之時，陰陽交會，始可以為昏禮，納采、問名」；《毛傳》則謂後兩句表示「遭時制宜，如遇水深則厲，淺則揭矣。男女之際，安可以無禮義？將無以自濟也。」<sup>134</sup>為了呼應「公與夫人並為淫亂」、「不依禮以娶」的主題，<sup>135</sup>《鄭箋》由氣候物象引申至婚禮，《毛傳》亦由遭時制宜引申至男女以禮義自濟，表面看來彷彿字字緊扣，呼應主題，實際上已跡近草木皆兵，鑿之過深。

傳統《詩經》學詮釋取向的好處或壞處，均在蔡元培的索隱研究中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。

## （二）《詩經》學在傳奇小說中的滲透與演變

余英時說過：「廣義的『典範』指一門科學研究中的全套信仰、價值和技術」，<sup>136</sup>因此除學術信念外，索隱紅學在研究技術層面所受的影響，同樣值得關注。蔡元培深信自己有一套嚴謹的考釋程序，包括品性相類、軼事有徵、姓名相關三種推求方法，且「每舉一人，率兼用三法或兩法，有可推證，始質言之。」<sup>137</sup>這三種方法均濫觴於傳箋之學中，但由韻文解讀移至小說的範疇，中間亦有一些變異，需要略作分疏。

<sup>130</sup> 同註 112，頁 209。

<sup>131</sup>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），頁 65。

<sup>132</sup> 同註 112，頁 138-139。

<sup>133</sup> 參吳萬鍾文，見註 123，頁 80-87；梁錫鋒：《鄭玄以禮箋〈詩〉研究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5 年）。

<sup>134</sup> 同註 112，頁 163。

<sup>135</sup> 同註 112，頁 162。

<sup>136</sup> 同註 1，頁 4。

<sup>137</sup> 同註 18，頁 1。

## 1. 軼事有徵

《毛傳》以史實釋詩，其釋證的強弱程度，主要取決於《序》中所述能否在詩歌原文或其他史傳中找到根據。朱熹分別把二者稱為「詩文明白，直指其事」，以及「證驗的切，見於書史」，其餘便只能「姑以其意推尋探索」了。<sup>138</sup>按照這些標準，《詩序》的可信度可以分為三類：最強的一類是同時有詩文及史傳的直接根據，如〈碩人〉詩中有「齊侯之子，衛侯之妻。東宮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譚公維私」等句，<sup>139</sup>清楚顯示莊姜的身分；又《左傳》隱公三年亦云：「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，曰莊姜，美而無子，衛人所為賦《碩人》也」，<sup>140</sup>二者均能佐證《詩序》所謂「閔莊姜」之說。其次是詩中雖無直接根據，但其他史傳中仍有相關的記述，如〈載馳〉與〈清人〉均只提到地方名，沒有述及人物名字或身分，但《左傳》閔公二年有「許穆夫人賦《載馳》」、「鄭人為之賦《清人》」等記述，<sup>141</sup>所以《毛傳》之說亦有一定根據。最弱的是詩文中只有簡接的根據，同時缺乏外在歷史文獻的支持，如毛氏以為〈河廣〉乃「宋襄公母歸于衛，思而不止，故作是詩也」，鄭《箋》雖發揮其說，但詩中實際上僅有「誰謂宋遠」一句較為符合《傳》意，<sup>142</sup>卻沒有直接道出相關人物，遂令後世學者多有質疑。<sup>143</sup>

《詩經》有三種史實可徵的型態，但小說傳奇通常僅剩下最弱的一項，因為縱是那些以歷史人物為主角的故事，也絕少會同時見諸正規的史著中。如六朝《搜神記》提及曹操載妓而覆的「曹公船」、<sup>144</sup>《列異傳》記華歆自知為公事，<sup>145</sup>這兩個故事只會收錄於《搜神後記》等性質相近的書中，而不會出現在較為嚴謹的著述內。唐代傳奇「有意為小說」，<sup>146</sup>大膽虛構、假托幻設，更是難以找到史實的根據，如〈古鏡記〉既有歷史上的真實人物，亦有不少虛構人物穿梭於其中。<sup>147</sup>因此論者詮釋小說的主旨時，往往只能在原文中標出可與史事簡接參證的材料，說明已見。元稹〈鶯鶯傳〉的張生，過去有以為指張籍，但趙德麟不同意此說，認為張生就是元稹本人。他先從張籍登科的時間入手，推翻舊說，然後比較元稹與張生的生平，指出兩者吻合的地方，如張生娶妻的年齡、鶯鶯與張生的中表關係

<sup>138</sup> 同註 16，朱熹：《詩序辨說》，第 1 冊，頁 361。

<sup>139</sup> 同註 112，頁 261。

<sup>140</sup> 同註 80，頁 90-91。

<sup>141</sup> 同註 80，頁 356、頁 358。

<sup>142</sup> 同註 112，頁 238。

<sup>143</sup> 參陳子展：《詩三百解題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）頁 212-214。

<sup>144</sup> 參謝明勳：《六朝小說本事考索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3 年），頁 211-213。

<sup>145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146</sup> 魯迅：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 9 冊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7 年），頁 70。

<sup>147</sup> Cf. Chen Jue, "History and Fiction in the *Gujing Ji* (Record of an Ancient Mirror)",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52(2004), pp. 178-180.

等，俱與元稹相符。<sup>148</sup>小說傳奇雖多幻設之言，與《詩經》的表述大有分別，但論者仍會如《毛傳》那樣細緻尋繹文本，與史實互相對照，發掘文本主旨。

從蔡元培列舉的例子可知，他所強調的「軼事有徵」基本上繼承了前人的詮釋方法。他認為賈寶玉指胤祜，其中一項根據就是二人均曾遭逢魔魘。胤祜的罪狀中提到他「忽起忽坐，言動失常，時見鬼魅，不安寢處，屢遷其居，啖飯七八碗尚不知飽，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見醉」。<sup>149</sup>這與《紅樓夢》第九十五回寶玉失玉後「吃不像吃，睡不像睡，甚至說話都無頭緒」，以及第八十一回寶玉在病中覺得站著時「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攔頭一棍，疼的眼睛前頭漆黑，看見滿屋子裏都是些青面獠牙、拿刀舉棒的惡鬼」等描述，<sup>150</sup>實在驚人地相似。又胤祜於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廢皇太子之位，半年後復立，三年多後又被廢等事，亦與《紅樓夢》二十五回寶玉魔魘，「雖被迷污，經和尚摩弄一回，依舊靈了」，但第九十四回最終失玉等遭遇相近。<sup>151</sup>不過這類探究極其量只能達到《毛傳》中證據最薄弱那類解釋的水平，因此亦如後者一樣，容易滋生各種疑竇，引起爭議。

## 2. 品性相類

「品性相類」指小說角色與歷史人物的品格性情相似，如「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年，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蓀友」。<sup>152</sup>當然，小說中的人物個性每每通過語言和行為來呈現，如徐乾學謂陳其年「每際稠人廣坐，伸紙援筆，意氣揚揚，旁若無人」，因而予人豪爽的感覺，這與史湘雲「大說大笑」、「極愛說話」的描述正相接近。<sup>153</sup>與軼事有徵最大的分別是，品性相類的描寫並沒有指向同一件事，如陳其年與史湘雲分別以援筆書寫和大說大笑展示共通的性格，卻不會像寶玉與胤祜那樣，經歷相同的胡言亂語、看見鬼魅等魔魘事件。由是而言，有關品性的情節描寫乃是一種帶有傾向性的象徵，讀者不能光從字面上去理解。蔡元培認為王熙鳳影余國柱，他的例證是這位順治九年的進士「文辭不多見」，與「王熙鳳不甚識字」相類，<sup>154</sup>但文辭不多與不識字差距甚遠，二者只有類比的關係，所以這條證極其量屬於品性相類，不能算是軼事有徵。兩種方法的分別雖然細微，卻尚算涇渭分明。

品性相類的解讀方法與《毛傳》以比興釋《詩》的做法相當接近。前文提過傳箋會尋繹全詩細節，佐證《小序》確立的主旨，因此詩中提及的景物，幾乎都可以含有指向題旨的特別涵義。〈柏舟〉以泛流的木舟表示「仁而不遇」，〈綠衣〉以綠衣黃裏表示「妾上僭」，

<sup>148</sup> 汪辟疆校錄：《唐人小說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170。有關問題可參吳儀鳳：〈從《鶯鶯傳》自傳說看唐傳奇的詮釋方法〉，《中國學術年刊》第28期春季號（2006年3月），頁133-160。

<sup>149</sup> 同註18，頁11。

<sup>150</sup> 曹雪芹著，馮其庸纂校訂定：《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》（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）頁1839。

<sup>151</sup> 同註18，頁14。

<sup>152</sup> 同註18，頁1。

<sup>153</sup> 同註18，頁28-29。

<sup>154</sup> 同註18，頁27。

正是景物與人的處境互相呼應的例子；其他例子如「雄雉于飛，泄泄其羽」喻「宣公整其衣服而起」，「毖彼泉水，亦流于淇」喻「婦人出嫁於於異國」，「蝮螫在東，莫之敢指」喻「君子見戒而懼，諱之莫之敢指」等，<sup>155</sup>更是舉不勝舉。除了以整個場地景物比喻人事狀況外，《詩經》中還有一些涉及人物的情節描寫被《毛傳》詮釋為象徵文字，〈靜女〉中提到的「彤管」就是著名的例子。「靜女其變，貽我彤管」，《傳》以為「彤管」指「古人之法」，表示靜女熟悉古人的禮法，「可以配人君也」。<sup>156</sup>《毛傳》所提女史彤管之法，並不見於其他典籍，雖然言之鑿鑿，但朱熹卻直言「彤管，未詳何物，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」，<sup>157</sup>把它視為普通的實物。朱熹的異見正可凸顯《毛傳》那套獨特的詮釋方法。

《毛詩》通過性質相近的景物情節暗示人物身分個性的做法，逐漸演變為小說戲曲中的影射解讀。<sup>158</sup>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後志》嘗引《崇文目》謂〈補江總白猿傳〉乃「唐人惡詢者為之」，<sup>159</sup>文中雖然從未道及歐陽詢之名，但書中提及白猿之子「厥狀肖焉」，與歐陽詢「貌獼猿」相類，<sup>160</sup>因此其背後蘊含的詆譏之意實亦不難明白。據王夢鷗考釋，今傳〈霍小玉傳〉「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」句中「名益」二字或為後人所增，當時未必敢指名點姓毀謗時流，<sup>161</sup>若是則後人乃因史傳言李益「少癡而忌克，防閑妻妾苛酷」，與小說中李生「大凡生所見婦人，輒加猜忌」的性格相近，於是把二人連結起來。<sup>162</sup>

這類影射式解讀在後世戲曲中也是相當流行，如《琵琶記》裏的蔡伯喈究竟影射蔡邕、王四、鄧敞、慕容喈，還是蔡卞，過去便有不同說法。<sup>163</sup>陳珏探究「影射」的語源和語義演變時，同樣認同影射源自《詩經》的比興傳統。<sup>164</sup>他指出「索隱小說」有「年表錯亂」(intentional anachronism)和「互文用典」(intertextual echoes)兩個重要特徵，<sup>165</sup>而《儒林外史》和《紅樓夢》則分別代表了兩種模式，前者「通過由作者或者文學批評提供的鑰匙，小說人物能準確無誤地作為歷史人物鑒別出來」，後者的「小說人物通常有多個可能

<sup>155</sup> 同註 112，頁 160，195-196，241。

<sup>156</sup> 同註 112，頁 205。

<sup>157</sup> 同註 16，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第 1 冊，頁 438。

<sup>158</sup> 陳大維對此有簡要的綜述，參氏著〈淺談我國古代文藝作品中的影射技法〉，《廣州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2 年第 1 卷第 11 期（2002 年），頁 38-43。

<sup>159</sup> 晁公武：《郡齋讀書後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）影四庫全書本，第 674 冊，頁 388。

<sup>160</sup> 同註 148，汪辟疆校錄：《唐人小說》，頁 18-21。

<sup>161</sup> 王夢鷗：《唐人小說研究二集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3 年），頁 62-67。

<sup>162</sup> 同註 148，汪辟疆校錄：《唐人小說》，頁 92-99。

<sup>163</sup> 參程華平：〈試論中國古代戲曲批評中的影射現象〉，《文藝理論研究》2008 年第 5 期（2008 年），頁 67-72。

<sup>164</sup> Chen Jue, "Shooting sand at people's shadow" Yingshe as a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,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47 (1999), p. 199.

<sup>165</sup> 陳珏著、王定安譯：〈歷史指涉的詩學大綱——以西方的觀點為參照談明清時期的「索隱小說」〉，收入楊乃喬、伍曉明主編：《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：樂黛雲教授七十五華誕特輯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頁 405。

的歷史對應人物」，儘管「《紅樓夢》評論家所使用的再現與小說人物對應的歷史人物的這套匹配技巧與《儒林外史》評論家所用的相同」。<sup>166</sup>可見蔡元培的解讀方法其來有自，並非他的發明。

### 3. 姓名相關

跟前兩項相比，「姓名相關」一法似乎與《毛傳》的關係最為薄弱。儘管我們知道，民間歌謠好用相關語，而《國風》既多「里巷歌謠之作」，<sup>167</sup>自亦不應例外。聞一多指出，〈芣苢〉中的芣苢不但「是一種植物，也是一種品性，一個 allegory」，考其古音，「『芣苢』既與『胚胎』同音，在《詩》中這兩個字便是雙關的隱語（英語所謂 Pun）」，乃後世歌謠中以蓮為憐、以藕為偶、以絲為思一類字法的先驅。<sup>168</sup>近年康金聲更發現《詩經》中的興句，實有「起情」的作用，即「運用諧音雙關的手法，以起興句末一字的諧聲字（音相同或音近似）暗示全章的詩情」，如〈黍離〉的興字「苗」、「穗」、「實」與「眇」、「碎」、「失」諧音，與詩中「混茫眇昧」、「心碎」、「恍然若失」的情調完全相合。<sup>169</sup>姑勿論他們的說法是否可信，即使真有其事，這些討論亦已超出毛亨、鄭玄、朱熹等傳統學者的知識範圍了。礙於語音學的發展，過去的注家並沒有特別注意到《詩經》的諧音問題，更遑論運用這些相關語箋釋詩中人物的本事了。因此蔡元培所用的「姓名相關」法，實與後世的小說詮釋有更為密切的關係。

六朝不少志怪故事都會藉隱語迂迴地表達作者的意圖，謝明勳把這些相關語區分為兩個系統，其一以「聲音」為主，另一則以「形體」為主。他所舉的諧音例子包括以「雉」喻「秩」、以「狗」喻「苟」、以「胡」喻「狐」、以「馬」喻「司馬氏」及以「槽」喻「曹氏」等；形體的例子則有「甄舒仲」（即予舍西土瓦中人）、「兩口」「手巾」（指呂布）和「力在左，革在右」（指石勒之勒）等。<sup>170</sup>由於傳奇故事多以口耳相傳，因此諧音相關的手法尤其多見。後世唐傳奇亦有以諧音暗示人物身分或特徵，如〈辛公平上仙〉中的人物辛公平、成士廉、王臻，便分別表示心公平、成事廉、忘真等寓意；<sup>171</sup>〈南柯太守傳〉的主角名棼，實表紛亂之意，反映作者的貶斥之意。<sup>172</sup>明代《平妖傳》中的狐狸精胡媚兒、胡黜兒以胡為姓，沿襲六朝之跡更是顯而易見；<sup>173</sup>張竹坡甚至謂《金瓶梅》中西門慶的名

<sup>166</sup> 同註 165，頁 407-408。

<sup>167</sup> 同註 16，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第 1 冊，頁 351。

<sup>168</sup> 聞一多：〈匡齋尺牘〉，見聞一多著，李定凱編校：《詩經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2 年），頁 42-43。

<sup>169</sup> 詳參康金聲：〈諧音雙關：詩「興」義探蹟一隅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03 年第 6 期（2003 年），頁 35-37。

<sup>170</sup> 參謝明勳：《六朝志怪小說故事考論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9 年），頁 206-229；另參註 145，頁 74-79。

<sup>171</sup> 卞孝萱：《唐傳奇新探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112。

<sup>172</sup> 同前註，頁 184。

<sup>173</sup> 馮夢龍：《平妖傳》（臺北：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1995 年），頁 23。

字與「罄」諧音，與李瓶兒之「瓶」結合就是「瓶罄」，表「骨髓暗枯」、「衰朽在即」之意云云。<sup>174</sup>

在這樣悠久的小說創作與文本解讀的歷史背景下，蔡元培提出姓名相關一法實在是自然不過的事。而且更為重要的是，《紅樓夢》本身亦有相當明顯的暗示，誘導讀者探索書中人名而喻意。如小說開篇即謂書中所述乃「將真事隱去」，「故曰『甄士隱』」，又因「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」，「故曰『賈雨村』云云」，<sup>175</sup>明確地點出下文甄士隱和賈雨村等人名，實有相關的涵義；稍作類推，其他人名如封肅（風俗）、卜固修（不顧羞）、詹光（沾光）、葛世仁（不是人）等，其意亦不難理解。就是書中的主角，作者亦以諧音暗示各人的身分，第五回〈終身誤〉的名句「空對著、山中高士晶瑩雪，終不忘、世外仙姝寂寞林」，便以「雪」「林」相關寶釵和黛玉的姓氏。<sup>176</sup>《石頭記索隱》所說的姓名相關，實亦不出這些範圍，如以林黛玉影朱彝尊，因林原為絳珠仙子，絳為赤色，珠與朱又同音，正是音義兼備的相關語。<sup>177</sup>與《紅樓夢》時代相接的《儒林外史》，書中角色與歷史人物的姓名一樣有不少關聯。<sup>178</sup>可見這是古典小說中相當流行的作法，蔡元培以此詮釋《紅樓夢》，亦有足夠的根據。

#### 四、結語

《春秋》與《詩經》雖同屬儒家經典，蘊含字面以外的深意，但由於表述的形式和內容有別，二者仍有本質上的差異。《詩經》無法如《春秋》那樣，從文本中完整推導出相關的史實和評論。《春秋》以獨特的史筆寄寓褒貶之意，明確指出人物身分，無所遁形，故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」；<sup>179</sup>反觀《詩經》雖同樣有美刺的作用，卻極少會點破被諷的對象，難以坐實，所以才會令「言之者無罪」。<sup>180</sup>表面地看，小說傳奇以敘事為主，與《春秋》史筆本來性質相近，但因作者主要通過影射的方式暗示人物身分，讀者詮釋背後本事時，所用方法反而會接近《詩經》的箋釋。

<sup>174</sup> 張竹坡：〈金瓶梅寓意說〉，引自朱一玄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匯編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419。

<sup>175</sup> 同註150，頁1-2。

<sup>176</sup> 同註150，頁116。

<sup>177</sup> 同註18，頁15。

<sup>178</sup> 參李漢秋編：《儒林外史研究資料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197-246。

<sup>179</sup> 同註53，頁459。

<sup>180</sup> 同註112，頁15。

蔡元培本人對此似乎頗為自覺，他在 1898 年 7 月 27 日的日記中，已有這樣的記述：

余喜觀小說，以其多關人心風俗，足補正史之隙，其佳者往往意內言外，寄托遙深，讀詩逆志，尋味無窮。前曾刺康熙朝士軼事，疏證《石頭記》，十得四五。近又有所聞，雜誌左方，用資印證。<sup>181</sup>

「讀詩逆志」四字誠然可圈可點。小說在功能上與輔助正史，但解讀時則須如讀詩那樣，尋味其旨。經過上文的辨析，可以斷定他的索隱探索確實與傳統《詩經》學有更為密切的關係，並非源自《春秋》筆法的解讀。除了詮釋的方向外，蔡元培所舉三法中，亦有兩項與傳箋之學相契合。由此可見，索隱範式源遠流長，它的好處和壞處，都能夠幫助我們瞭解傳統的文學解讀模式。

---

<sup>181</sup> 蔡元培：《日記》1898年7月27日，同註72，第15卷，頁187。

## 徵引文獻

### 古籍

- 東漢·班固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）。
- 東漢·鄭康成：《禮記鄭注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92年）。
- 劉宋·范曄：《後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。
- 梁·蕭統輯，唐·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71年）。
- 唐·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- 唐·孔穎達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- 唐·徐彥：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9年）。
- 唐·陸淳：《春秋集傳纂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影四庫全書本。
- 明·馮夢龍：《平妖傳》（臺北：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1995年）。
- 宋·朱熹：《朱子語類》，朱傑人等主編：《朱子全書（修訂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0年）。
- 宋·朱熹：《詩序辨說》，朱傑人等主編：《朱子全書（修訂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0年）。
- 宋·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見朱傑人等主編：《朱子全書（修訂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0年）。
- 宋·晁公武：《郡齋讀書後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影四庫全書本。
- 清·金聖嘆評點：《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》（河南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。
- 清·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。
- 清·陳康祺：《郎潛紀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。
- 清·焦循：《孟子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。
- 清·焦循：《雕菰集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文選樓叢書本，1967年）。
- 清·劉逢祿：《劉禮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。
- 清·劉逢祿：《論語述何》，載嚴靈峯編：《無求備齋論語集成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年）。
- 清·魏源：《魏源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6年）。

### 近人論著

- 一粟編：《紅樓夢卷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。

- 卞孝萱：《唐傳奇新探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）。
- 王平：〈也談「索隱派」與「考證派」——兼與陳維昭兄商榷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2004年第3輯（2004年），頁184-199。
- 王基倫：〈「《春秋》筆法」的詮釋與接受〉，載林慶彰，蔣秋華主編《經典的形成、流傳與詮釋》第1冊（臺灣：學生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375-414。
- 王夢鷗：《唐人小說研究二集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3年）。
- 王憲明：〈真假有無與「借事明義」——兼論索隱派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1997年第4輯（1997年），頁143-146。
- 皮錫瑞：《經學通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。
- 皮錫瑞著，周予同注釋：《經學歷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）。
- 石昌渝：〈春秋筆法與《紅樓夢》的敘事方略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2004年第1輯（2004年），頁142-158。
- 朱一玄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匯編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
- 朱維錚：《中國經學史十講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
- 余正培：《詩經正詁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年）。
- 余冠英：〈是「微言大義」呢，還是穿鑿附會？〉，《人民文學》1955年1月號（1955年1月），頁92-96。
- 余英時：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1年）。
- 吳萬鍾：《從詩到經——論毛詩解釋的淵源及其特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）。
- 吳儀鳳：〈從《鶯鶯傳》自傳說看唐傳奇的詮釋方法〉，《中國學術年刊》第28期春季號（2006年3月），頁133-160。
- 李淵良：〈春秋筆法：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技巧〉，《北京論叢》2008年第6期（2008年），頁25-30。
- 李淵良：〈春秋筆法與中國小說敘事學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08年第6期（2008年），頁38-42。
- 李貴生：〈索隱的合法性及其局限：蔡元培、胡適紅學論爭的範式意義〉，《東方文化》2014年第47卷第1期（2014年），頁29-62。
- 李漢秋編：《儒林外史研究資料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。
- 汪辟疆校錄：《唐人小說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。
- 周予同著，朱維錚編：《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（增訂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）。
- 周汝昌：〈還「紅學」以學——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（重點摘要）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995年第4期（1995年），頁36-49。
- 林義正：《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》（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2003年）。
- 侯外廬：《中國思想史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。
- 俞平伯：《俞平伯論紅樓夢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）。
- 俞平伯輯：《脂硯齋紅樓夢輯評》（香港：太平書店，1979年）。

- 胡楚生：〈試論《春秋公羊傳》中「借事明義」之思維模式與表現方法〉，《中興大學文史學報》第30期（2000年6月），頁1-31。
- 胡頌平編：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4年）。
- 胡適著，季羨林主編：《胡適全集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）。
- 胡適著，歐陽哲生編：《胡適文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
- 孫玉明：《紅學：1954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，2003年），頁236。
- 孫春在：《清末的公羊思想》（臺灣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）。
- 晁福林：〈讚美憂愁：論上博簡《詩論》關於《詩·柏舟》的評析〉，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8年第4期（2008年），頁60-67。
- 康有為：《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（上）》，蔣貴麟主編：《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（七）》（臺北：宏業書局，1976年）。
- 康金聲：〈諧音雙關：詩「興」義探蹟一隅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03年第6期（2003年），頁35-37。
- 張暉：《中國「詩史」傳統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2年）。
- 曹雪芹著，馮其庸纂校訂定：《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》（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- 梁啟超著，朱維錚校注：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）。
- 梁錫鋒：《鄭玄以禮箋〈詩〉研究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
- 許雪濤：《公羊學解經方法：從〈公羊傳〉到董仲舒春秋學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
- 許維通：《呂氏春秋校釋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5年）。
- 郭玉雯：《紅樓夢學——從脂硯齋到張愛玲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2004年）。
- 陳大維：〈淺談我國古代文藝作品中的影射技法〉，《廣州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2年第1卷第11期（2002年），頁38-43。
- 陳子展：《詩三百解題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）。
- 陳子展：《詩經直解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3年）。
- 陳才訓：〈「春秋筆法」對古典小說審美接受的影響〉，《信陽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第28卷第3期（2008年6月），頁125-128。
- 陳才訓：《源遠流長：論〈春秋〉〈左傳〉對古典小說的影響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。
- 陳才訓：〈「春秋筆法」與《紅樓夢》審美接受〉，《吉首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8年，第29卷第1期（2008年），頁115-118。
- 陳才訓：〈含蓄暗示與客觀展示——論「春秋筆法」對《紅樓夢》敘事藝術的影響〉，《西華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8年第4期（2008年），頁6-10。
- 陳其泰：《清代公羊學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7年）。
- 陳珏著，王定安譯：〈歷史指涉的詩學大綱——以西方的觀點為參照談明清時期的「索隱小說」〉，載楊乃喬、伍曉明主編：《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：樂黛雲教授七十五華誕特輯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401-41。

- 陳維昭：〈《石頭記》脂評與傳統的本事注經方式〉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2003年第3期（2003年），頁99-111。
- 陳維昭：〈「自傳說」與本事注經模式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2003年第4輯（2003年），頁14-33。
- 陳維昭：《紅學通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
- 陳維昭：〈索隱、考證與「新紅學」的本質——答王平兄兼論紅學史諸問題〉，《洛陽師範學院學報》2005年第3期（2005年），頁76-80。
- 陳維昭：〈考證與索隱的雙向運動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1998年第4輯（1998年），頁180-194。
- 陳維昭：〈索隱派紅學與互文性理論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2001年第2輯（2001年），頁278-291。
- 陳維昭：〈索隱派紅學與詩騷學術傳統〉，《汕頭大學學報（人文科學版）》1995年第11卷第1期（1995年），頁40-48。
- 陳廣宏：《文學史的文化敘事——中國文學演變論集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。
- 單周堯：〈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序》五情說補識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2010年第20卷第4期（2010年），頁79-119。
- 程元敏：《詩序新考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5年）。
-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）。
- 程華平：〈試論中國古代戲曲批評中的影射現象〉，《文藝理論研究》2008年第5期（2008年），頁67-72。
- 馮其庸：《石頭記脂本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
- 葉夢得：《葉氏春秋傳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影四庫全書本。
- 聞一多著，李定凱編校：《詩經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2年）。
- 趙生群：《〈春秋〉經傳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- 齊學東，〈索隱派的舊版翻新——評「劉心武揭秘《紅樓夢》」〉，《福建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6年第3期（2006年），頁127-131。
- 劉毓慶、郭萬金：《從文學到經學——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- 劉夢溪：《紅樓夢與百年中國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。
- 潘秀玲：《〈詩經〉存古史考辨——《詩經》與《史記》所載史事之比較》（臺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
- 蔡元培：《石頭記索隱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8年）。
- 蔡元培：《蔡元培全集》（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
- 蔣慶：《公羊學引論》（沈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）。
- 魯迅：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9冊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7年）。
- 蕭鋒：〈從「春秋書法」到「春秋筆法」名稱之考察〉，《北方論叢》2009年第2期（2009年），頁10-13。
- 錢玄同：〈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〉，顧頡剛編：《古史辨》第5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22-101。

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。

錢穆：《孔子與春秋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8冊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4年）。

錢穆：《莊子纂箋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1993年）。

錢鍾書：《管錐編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）。

謝明勳：《六朝小說本事考索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3年）。

謝明勳：《六朝志怪小說故事考論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9年）。

顏建華：〈阮元《研經室集》集外文輯佚〉，《湖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5年第19卷第5期（2005年），頁79-82。

顧友澤：〈對紅學索隱派研究方法的再思考〉，《蘇州教育學院學報》第00期（2005年9月），頁39-42。

Chen Jue, “Shooting sand at people’s shadow” Yingshe as a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,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47 (1999), p. 199.

Chen Jue, “History and Fiction in the Gujing Ji (Record of an Ancient Mirror)”,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52(2004), pp. 178-180.

## Bibliography

- Ban, Gu. *Han Shu*, Beijing: Zhonghua Shuju (1962).
- Bian, Xiao-xuan. *Tang Chuanqi Xintan*, Nanjing: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er House (2001).
- Cai, Yuan-pei. *Cai Yuanpei Quanji*, Hangzhou: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er House (1998).
- Cai, Yuan-pei. *Shitouji Suoyin*, Shanghai: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(2008).
- Cao, Xue-qin (Author); Feng, Qi-yong (Editor). *Zhongxiao Bajia Pingpi Honglou Meng*, Nanchang: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er House (2000).
- Chao, Fulin. “Zanmei Youchou: Lun Shangbojian *Shilun* Guanyu *Shi Baizhou* de Pingxi”, *Beijing Shifan Daxue Xuebao*, (4)2008, pp. 60-67.
- Chao, Gon-gwu. *Junzhai Dushu Houzhi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(1987).
- Chen, Cai-xun. “Implicit Narration and Objective Narration in *The Red Chamber Dreams*”, *Xihua Shifan Daxue Xuebao*, (4)2008, pp. 6-10.
- Chen, Cai-xun. “Succinct and Implicit Narration and the Esthetic Appreciation in *A Dream of Red Mansion*”, *Jishou Daxue Xuebao*, (29)2008, pp. 115-118.
- Chen, Cai-xun. “The Influence of the Succinct and Implicit Narration on the Aesthetic Acceptance of the Classical Novels”, *Xiny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*, (28:3)2008, pp. 125-128.
- Chen, Cai-xun. *Yuanyuan Liuzhang: Lun Chunqiu Zuochuan Dui Gudian Xiaoshuo de Yingxiang*, Beijing: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(2008).
- Chen, Da-wei. “On Allusion as a Literary Technique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”, *Qiantan Woguo Gudai Wenyi Zuopin Zhong de Yingshe Jifa*, *Guangzhou Daxue Xuebao*, (11:1)2002, pp. 38-43.
- Chen, Guang-hong. *Wenxueshi de Wenhua Xushi: Zhongguo Wenxue Yanbian Lunji*, Shanghai: Fudan University Press (2012).
- Chen, Jue, “‘Shooting sand at people’s shadow’ Yingshe as a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”,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47 (1999), p. 199.
- Chen, Jue, “History and Fiction in the *Gujing Ji* (Record of an Ancient Mirror)”,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52(2004), pp. 178-180.
- Chen, Jue (Author); Wang, Ding-an (Translator) “Poetics of Historical Referentiality: An Outline”, Wang dingan trans., in Yang naiqiao & Wu xiaoming (Editor), *Bijiao Wenxue yu Shijie Wenxue: Le Daiyun Jiaoshou Qishiwu Hua Dan Teji*, Beijing: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, 2005, pp. 401-41.
- Chen, Kang-qi. *Langqian Jiwen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Press (1997).
- Chen, Qi-tai. *Qingdai Gongyangxue*, Beijing: Eastern Press (1997).

- Chen, Wei-zhao. "Kaozheng yu Suoyin de Shuangxiang Yun dong, *Honglouneng Xuekan*, (4)1998, pp. 180-194.
- Chen, Wei-zhao. "Shitouji Zhiping yu Chuantong de Benshi Zhujing Fangshi, *Ming Qing Xiaoshuo Yanjiu*, (3)2003, pp. 99-111.
- Chen, Wei-zhao. "Suoyin Kaozheng yu 'Xinhongxue' de Benzhi: Da Wang pingxiong Jianlun Hongxueshi Zhu Wenti", *Luoy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*, (3)2005, pp. 76-80.
- Chen, Wei-zhao. "Suoyinpai Hongxue yu Huwenxing Lilun, *Honglouneng Xuekan*, (2)2001, pp. 278-291.
- Chen, Wei-zhao. "Suoyinpai Hongxue yu Shisao Xueshu Chuantong, *Shantou Daxue Xuebao*, (11:1)1995, pp. 40-48.
- Chen, Wei-zhao. "Zichuanshuo yu Benshi Zhujing Moshi, *Honglouneng Xuekan*, (4)2003, pp. 14-33.
- Chen, Wei-zhao. *Hongxue Tongshi*, Shanghai: Shanghai Renmin Press (2005).
- Chen, Zi-zhan. *Shijing Zhijie*, Shanghai: Fudan University Press (1983).
- Chen, Zi-zhan. *Shisanbai Jieti*, Shanghai: Fudan University Press (2001).
- Cheng, Yuan-min. *Shixu Xinkao*, Taipei: Wunan Publishing House (2005).
- Cheng, Hua-ping. "Shilun Zhongguo Gudai Xiqu Pipingzhong de Yingshe Xianxiang", *Wenyi Lilun Yanjiu*, (5)2008, pp. 67-72.
- Cheng, Jun-ying & Jiang Jian-yuan. *Shijing Zhuxi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91).
- Fan, Ye. *Hou Hanshu*.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65).
- Feng, Meng-long. *Pingyao Chuan*, Taipei: Laur'eat Publisher (1995).
- Feng, Qi-yong. *Shitouji Zhiben Yanjiu*, Beijing: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 (2006).
- Gu, You-ze. "Dui Hongxue Suoyinpai Yanjiu Fangfa de Zaisikao, *Suzhou Jiaoyu Xueyuan Xuebao*, (9)2005, pp. 39-42.
- Guo, Yu-wen. *Honglou Meng Xue: Cong Zhi yanhai Dao Zhang ailing*, Taipei: Liren Bookstore (2004).
- Hou, Wai-lu. *Zhongguo Sixiangshi*, Beijing: Renmin Press (1992).
- Hu, Chu-sheng. "Shilun Chunqiu Gongyangchuan zhong 'Jieshi Mingyi' zhi Siwei Moshi yu Biaoxian Fangfa, *Zhongxing Daxue Wenshi Xuebao*, (6)2000, pp. 1-31.
- Hu, Song-ping ed. *Hushizhi Xiansheng Nianpu Zhangbian Chugao*, Taipei: Linking Publisher (1984).
- Hu, Shi (Author); Ou-yang, Zhes-heng (Editor). *Hushi Wenji*, Beijing: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(1998).
- Ji, Xian-lin ed. *Hushi Quanji*, Hefei: Anhui Education Publisher House (2003).
- Jiang, Qing. *Gongyangxue Yinlun*, Shenyang: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er House (1995).
- Jiao, Xun. *Diaogu Ji*, Taibei: Yeewen Publishing Company (1967).
- Jiao, Xun. *Mengzi Zhengyi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82).
- Jin, Sheng-tan (Comment). *Diwu Cazi Shu Shi naian Shuihu Chuan*, Henan: Zhong 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er (1985).
- Kang, Jin-sheng. "Xieyin Shuangguan: Shi Xingyi Tanze Yiyu, *Wenxue Pinglun*, (6)2003, pp. 35-37.

- Kang, You-wei. *Chunqiu Bixue da Yiweiyuan Kao*, in Jiang guilin ed., Kang nanhai Xiansheng Yizhe Huikan, vol 7, Taipei: Hongye Shuju (1976).
- Kong, Ying-da. *Chunqiu Zuochuan Zhengyi*, Beijing: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(2000).
- Kong, Ying-da. *Maoshi Zhengyi*, Beijing: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(2000).
- Lee, Kwai-Sang, ‘The Legitimacy of Allegorical Studies and Its Limitations: The Paradigmatic Significance of the Debate between Cai Yuanpei and Hu Shi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’. *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*, (47:1)2014, p.p.29-62.
- Li, Han-qiu ed. *Rulin Waishi Yanjiu Ziliao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(1984).
- Li, Yuan-liang. “Chunqiu Bifa yu Zhongguo Xiaoshuo Xushixue”, *Wenxue Pinglun*, (6)2008, pp. 38-42.
- Li, Yuan-liang. “Chunqiu Bifa: Zhongguo Gudai Xiaoshuo de Xushi Jiqiao”, *Beijing Luncong*, (6)2008, pp. 25-30.
- Liang, Qi-chao. *Liang qichao Lun Qingxueshi Erzhong*, Shanghai: Fudan University Press (1985).
- Liang, Xi-feng. *Zhengxuan Yili Jian Shi Yanjiu*, Beijing: Academy Press (2005).
- Lin, Yi-zheng. *Chunqiu Gongyangchuan Lunli Siwei yu Tezhi*, Taipei: National Tawan University Press (2003).
- Liu, Feng-lu. *Liu Libu Ji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(1995).
- Liu, Feng-lu. *Lunyu Shuhe*, Taipei: Yeewen Publishing Company (1966).
- Liu, Meng-xi. *Hongloumeng yu Bainian Zhongguo*, Shijiazhuang: Hebei Education Publisher House (1999 University Press).
- Liu, Yu-qing & Guo Wan-jin. *Cong wenxue Dao jingxue: Xianqin Lianghan Shijingxue Shilun*, Shanghai: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(2009).
- Lu, Chun. *Chunqiu Jichuan Zuanli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Ltd (1987).
- Lu, Xun. *Zhongguo Xiaoshuo Shilue*, Beijing: People’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(1987).
- Ma, Rui-chen. *Maoshi Chuanjian Tongshi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89).
- Pan, Xi-uling. *Shijing cunqushi Kaobian: Shijing yu Shiji Suozai Shishi Zhi Bijiao*, Taipei: Huamulan Cultuer Publisher (2006).
- Pi, Xi-rui. *Jingxue Lishi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81).
- Pi, Xi-rui. *Jingxue Tonglun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89).
- Qi, Xue-dong. “The Refashion Study of Index Faction——On the “LIU Xin-wu Uncovers the Secret of Hong Lou Meng”, *Fujian Shifan Daxue Xuebao*, (3)2006, pp. 127-131.
- Qian, Mu. *Kongzi yu Chunqiu*, Taipei: Linking Publisher (1994).
- Qian, Mu. *Zhongguo Jinsanbainian Xueshushi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89).
- Qian, Mu. *Zhuangzi Zuanjian*, Taipei: Dongda Books Company (1993).
- Qian, Xuan-tong. “Zhonglun Jingjin Guwenxue Wenti”, in Gu ji-egang (Editor), *Gushi Bian* vol. 5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(1982), pp 22-101.
- Qian, Zhong-shu. *Guanzhui Bian*, Xiangga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90).

- Shi, Chang-yu. "Chunqiu Bifa yu Honglouloumeng de Xushi Fanglue, *Honglouloumeng Xuekan*, (1)2004, pp. 142-158.
- Sin, Chow-yiu. "Supplementary Notes on the Theory of Five Emotions in Du Yu's 'Preface to Collected Exegeses of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Chunqiu'", *Zhongguo Wenzhe Yanjiu Tongxun*, (20:4)2010, pp. 79-119.
- Sun, Chun-zai. *Qingmo de Gongyang Sixiang*, Taiwan: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 (1985).
- Sun, Yu-ming. *Hong xue: 1954*, Beijing: Beijing Tushuguan, 2003, pp. 236.
- Wang, Ji-lun. "Chunqiu Bifa de Quanshi yu Jieshou", in Lin qing zhang & Jiang qiuhua ed., *Jingdian de Xingcheng Liuchuan yu Quanshi* vol 1, Taiwan: Xuesheng Shuju, 2007, pp. 375-414.
- Wang, Meng-ou. *Tangren Xiaoshuo Yanjiu Erji*, Taipei: Yeewen Publishing Company (1973).
- Wang, Pi-jiang. *Tangren Xiaoshuo*, Xiangga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87).
- Wang, Ping. "Yetan Suoyinpai yu Kaozhengpai: Jianyu Chen weizhaoxiong Shangque, *Honglouloumeng Xuekan*, (3)2004, pp. 184-199.
- Wang, Xian-ming. *Zhenjia Youwu yu Jieshi Mingyi: Jianlun Suoyinpai*, *Honglouloumeng Xuekan*, (4)1997, pp. 143-146.
- Wei, Yuan. *Wei yuan Ji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76).
- Wen, Yi-duo (Author); Lee, Ding-kai (Edit Correction). *Shijing Yanjiu*, Chengdou: Bashu Publishing House (2002).
- Wu, Wan-zhong. *Cong Shi Dao Jing: Lun Maoshi Jieshi de Yuanyuan Jiqi Tese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2001).
- Wu, Yi-feng. "Cong Yingyingchuan Zichuanshuo Kan Tangchuanqi de Quanshi Fangfa", *Zhongguo Xueshu Niankan*, (28)2006, pp. 133-160.
- Xiao, Feng. "Cong Chunqiu Shufa Dao Chunqiu Bifa Mingcheng Zhi Kaocha, *Beifang Luncong*, (2)2009, pp. 10-13.
- Xiao, Tong (Editor); Lee, Shan (Noto). *Wen Xuan*, Taipei: Zhengzhong Bookstore (1971).
- Xie, Ming-xun. *Liuchao Xiaoshuo Benshi Kaosuo*, Taipei: Liren Bookstore (2003).
- Xie, Ming-xun. *Liuchao Zhiguai Xiaoshuo Gushi Kaolun*, Taipei: Liren Bookstore (1999).
- Xu, Wei-yu. *Lushi Chunqiu Xiaoshi*, Beijing: Zhong guo Bookstore (1985).
- Xu, Xue-tao. *Gongyangxue Jiejing Fangfa: Cong Gongyangchuan Dao Dong Zhonghu Chunqiu xue*, Guangzhou: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(2006).
- Xu, Yan. *Chunqiu Gongyangchuan Zhushu*, Taipei: Yeewen Publishing Company (1989).
- Yan, Jian-hua. "A Compilation of Works Uncollected in Ruan Yuan's Volumes of Classics Studies", *Hunan Daxue Xuebao*, 19:5 (2005), pp. 79-82.
- Ye, Meng-de. *Yeshi Chunqiu chuan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(1987).
- Yi, Su (Editor). *Honglouloumeng Juan*, Beijing: Zhonghua Bookstore (1965).
- Yu, Guan-ying. "Shi 'Weiyan Dayi' ne, Haishi Chuanzao Fuhui, *Renmin Wenxue*, 1 (1955), pp. 92-96.

- Yu, Ping-bo ed. *Zhiyanzhai Honglouloumeng Jiping*, Xianggang: Taiping Bookstore (1979).
- Yu, Ping-bo. *Yu Pingbo Lun Honglouloumeng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(1988).
- Yu, Ying-shi. *Honglouloumeng de Liangge Shijie*, Taipei: Linking Publisher (1991).
- Yu, Zheng-pei. *Shijing Zhenggu*, Taipei: San Min Book Co., Ltd (1993).
- Zhang, Hui. *Zhongguo 'shishi' Chuantong*, Beijing: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(2012).
- Zhao, Sheng-qun. *Chunqiu Jingchuan Yanjiu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(2000).
- Zheng, Kang-cheng. *Liji Zhengzhu*, Taipei: Xuehai Publishing Company (1992).
- Zhou, Ru-chang. "Restore the Academic Feature of 'The Study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': A Retrospec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During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", *Beijing Daxue Xuebao*, (4)1995, pp. 36-49.
- Zhou, Yu-tong (Author); Zhu, Wei-zheng (Editor). *Zhou Yutong Jingxueshi Lunzhe Xuanji(revision)*, Shanghai: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(1996).
- Zhu, Wei-zheng. *Zhongguo Jingxueshi Shijiang*, Shanghai: Fudan University Press (2002).
- Zhu, Xi. *Shi Jichuan*, in Zhu jieren ed., *Zhuzi Quanshu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, Hefei: Anhui Jiaoyu Chubanshe (2010).
- Zhu, Xi. *Shixu Bianshuo*, in Zhu jieren ed., *Zhuzi Quanshu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, Hefei: Anhui Jiaoyu Chubanshe (2010).
- Zhu, Xi. *Zhuzi Yulei*, in Zhu jieren ed., *Zhuzi Quanshu*,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, Hefei: Anhui Jiaoyu Chubanshe (2010).
- Zhu, Yi-xuan (Editor). *Jinpingmei Ziliao Huibian*, Tianjin: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(2002).

# Allegorical Metaphors versus Subtle Words : with Focus on the Classical Origins of Cai, Yuan-pei's Redology

Lee, Kwai-sang

( Received May 22, 2014 ; Accepted March 25, 2015 )

## Abstract

Based on Cai's *Shitouji suoyin* (An Allegorical Reading of *The Story of the Stone*), this article will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*Suoyin* Redology and tradition Classical studies. It will first review the shortcomings of a prevalent view that the *Suoyin* method is originated from the studies of *Chunqiu* (*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), and then illustrate how the exegetical studies of *Shijing* (*The Book of Odes*) influences on the hermeneutical horizon as well as the *modus operandi* of Cai's Redology. After a close examination, we assert that the hermeneutical approach of Cai's *Suoyin* is deeply connected to the traditional studies of *Shijing* and, among the three methods suggested by Cai, two of them are accorded with exegetical studies.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exegeses on 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.

Keywords: Allegorical Metaphors, Subtle Words, Cai, Yuan-pei, Redology, Classical Studies, Origins